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2 November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年11月5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20年11月3日星期二召开的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冲突与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的视频会议上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非洲联盟发展署首席执行官易卜拉欣·马亚基先生、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希拉里·比克尔斯爵士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穆尼尔·阿克兰先生阁下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身份所作通报的副本，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兼公用事业、国家安全、格林纳丁斯事务和司法部长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阁下、突尼斯外交部长奥斯曼·杰兰迪先生阁下、比利时发展合作大臣 Meryame Kitir 女士阁下、爱沙尼亚外交部副部长 Andres Rundu 先生阁下、德国联邦外交部国务部长 Niels Annen 先生阁下、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韦尔谢宁先生阁下、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副部长阿尔文·博特斯先生阁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负责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的国务大臣温布尔登的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阁下、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怀忠先生阁下以及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尔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所作发言的副本。

根据安理会成员就本次视频会议达成的谅解，以下代表团和实体提交了书面发言，并随函附上副本：阿塞拜疆、巴西、佛得角、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丹麦、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欧洲联盟、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列支敦士登、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荷兰、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苏丹、瑞士、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 (S/2020/372) 中所述、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上述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罗恩塔·金(签名)



附件1

常务副秘书长的发言

我感谢冈萨维斯主席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我祝贺该国成为有史以来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最小的国家。该国政府还担任了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主席，证明小国在多边体系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表明，当今世界没有遥远的危机这一说。这场大流行病继续加剧冲突的风险和从跨界不安全和气候方面的威胁到社会动乱和民主赤字等各种冲突动因，不满与不平等正在加深，侵蚀对当局和各种机构的信任，并且增加脆弱性。

这场危机正在逆转发展和建设和平已取得的成果，加剧冲突，破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它还破坏性地影响人权和性别不平等。COVID-19使现有人道主义危机中的弱势民众暴露在新的威胁下。冲突方则利用这场大流行病来制造或者增加不安全，阻碍医疗保健以及其它拯救生命的援助与服务。

妇女受雇于受锁闭影响最严重部门的比例超高，因而比男性更有可能缺少存款、社会保障以及健康保险。锁闭还导致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惊人地增多。在千百万妇女在自己的家中面临更大风险时，我们怎能谈论和平与安全？我们知道，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与压迫民众和冲突之间有着直接关联。

气候突发事件是不平等、不安全以及冲突的一个主要动因。我本人就看到萨赫勒地区、乍得湖地区、中东以及其它地方气候与安全挑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包括：民众大批流离失所，争抢资源，以及破坏房屋、生计和社区的旱灾和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有些情况下，气候危机威胁到国家本身的存在。

气候危机还削弱社区的复原力，限制青年可得到的机会。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它让人丧失希望，有可能形成一代怨愤不满、容易被各种极端分子利用的年轻人。冲突的驱动因素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变化与演变之中。要建设和平并保持和平，就必须在这些因素演变和互动的同时处理根源，包括这场大流行病带来的新兴威胁。

冲突、气候变化以及发展停滞这些问题彼此加强，但是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工作却常常条块分割。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是机会也是多方面的。这场大流行病已经表明，随着千百万民众采用新的工作、学习和社交方式，快速变化是可能的。在我们努力恢复时，我们不能回到那些已经失败的框架与系统中去，它们制造的弱势与不平等正在被这场大流行病放大。我们必须面向未来，重建得更好。

我赞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远见，“我们仍有机会将COVID-19后的世界建设得更好”（S/2020/1064，附件，第2段），这也是本次辩论会的基调。

这场大流行病突出表明，必须对包容和平等的治理与机构进行投入，并且解决问题的根源，以便处理不只是冲突、而且还有各种危机与冲击的动因。它使《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有必要，因为这是我们最终的预防工具。

从大流行病中恢复的工作必须优先建立具有复原力的倡导法治、良政、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性以及人权的包容并且接受问责的机构。伙伴关系、包括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伙伴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恢复工作还必须包括实施各种解决方案,以防止气候方面的因素导致冲突,并保护社区免遭其影响。会员国和各种开发银行应在预警系统和增强复原力的措施上进行投入,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高风险国家应该能够使用新技术和遥感技术来帮助它们进行预测和预防。

只有采取一种统筹连贯的全联合国的做法,我们才能处理这些多层面的挑战。2016年关于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双重决议—第2282 (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以及秘书长的改革加大了本组织侧重预防的力度。

鉴于安理会在防止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关键作用,我欢迎它对处理冲突与不稳定的当代动因给予更多关注。秘书长曾对安全理事会7月份通过第2532 (2020)号决议支持他的即刻全球停火呼吁表示欢迎。

最后,我要回顾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在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下作出新的努力,到今年年底实现全球停火。我期待大家都对该呼吁作出承诺。我们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与我们共同的敌人——病毒——的斗争中。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与安宁的时候,我还期待大家为预防和解决重新投入政治和财政资源,以避免安全和冲突风险。

附件2

非洲联盟发展署首席执行官易卜拉欣·马亚基的发言

[原件: 法文]

我恳请大家关注整个西非,尤其是萨赫勒的危急局势。该区域是挑战的集中发生地,必须明确界定这些挑战,以便妥善解决。我想回顾几个事实。

过去20年来,西非人口增加了72%。它预计到2050年将再次翻番。城市将承担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增长。中小城市会比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发展更快。由于人口增长,一些村庄甚至已经在转变成城市集群。例如在尼日尔,有1万至5万人口的城镇数量从2010年的40个增加到如今的84个。

在西非,由于贫困和缺乏基本社会服务等深层结构性原因,处于粮食危机或处境更恶劣——用预警工具“协调框架”的术语来说——的人数在歉收季节每年都在增加。需要持续粮食和营养援助的西非人中有三分之一在萨赫勒中部的三个国家。

这些国家由于自然人口增长率高,它们及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领土的能力仍然明显不足。像马里这样每1000名居民对应6名政府雇员的国家难以提供最起码的公共服务。该国每10000名居民对应一名医生,每50万名居民对应一所医院。

近年来,这些结构性原因中又增加了安全问题。和平、安全与发展紧密相连。如今,我们在萨赫勒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突出,同时不安全状况骤增。

遍及整个区域的复杂安全危机明显影响到平民。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武装暴力引起了粮食和营养状况方面的严重关切。布基纳法索因武装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数已超过100万,占该国人口的5%。

跨界地区,如利普塔科-古尔马和乍得湖流域,是西非大量民众的家园。虽然这些地区经济上已经高度融合,并由于长期的社会团结而联合在一起,但它们也尤其受到不安全的影响。四成暴力行为发生在上述任一边界50公里范围内。

正如最近于10月20日举行的部长级圆桌会议所突出表明的那样,1300多万人现在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他们当中最脆弱的人生活在条件不适的营地里,给接收方居民造成了压力。

新的风险因素恶化了本已脆弱的局势,加剧了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和充满挑战的安全局势。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干旱以来,萨赫勒遭遇了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也有所增加。最近的暴雨及其造成的破坏就是一个突出实例。在尼日尔,洪水已经影响了50万人。

由于该区域供应链受到严重中断,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使数百万人陷入粮食和营养不安全。这些中断导致购买力下降和获取粮食困难,现在又迫使萨赫勒中部600万人陷入赤贫。

在西非,2015年粮食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萨赫勒和西非俱乐部估计,超过820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受到与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出行限制的直接冲击。这种预防性卫生措施实际上影响了非正规工作者的生计。

三分之二西非妇女在粮食部门工作,占到劳动力的51%。她们往往从事最不稳定的工作,极少有或根本没有社会保障。此外,在医院系统内,妇女身处

抗击疫情的前线和中心。在社区一级，她们往往提供无偿保健服务，并照料家庭内的病人。因此，她们特别容易受到感染。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不不断变化的多层面危机的催化剂。幸运的是，存在减轻各国社会经济脆弱性和财务贫困的解决方案。同样，我们可以对环境问题不确定性和全球大流行病造成的状况产生影响。

以下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措施：提供消除长期粮食脆弱性的结构性对策；将农业粮食经济的非正规部门视为发展的优先驱动力；促进区域合作势头，并将边界战略作为政策杠杆；以三管齐下的综合方式加强人道主义领域、发展与和平之间的联系；支持气候变化适应举措并发展预警系统；考虑到当地现实，即参考COVID-19危机期间和之后所有旨在保护就业和生计的措施；加大对妇女的支持，同时在应对COVID-19危机的所有恢复政策中纳入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应对措施。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共同努力解决危机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残酷危机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另一方面是加剧危机的一些新问题的发生速度和强度，这让我们有责任就当前动态形成更全面精准的认识。我们必须确保获得数据和数据分析成为制定适当公共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基石。

我要强调最后一点。数据、数据分析和围绕数据建立的共识为我们提供了制定全面、一致和可持续干预政策和方法的重要工具。它们能促成更好的合作并有效适应当地现实。

因此，如果我们确实想扭转这种恶性循环，满足我们所服务民众的巨大需求，给萨赫勒和西非带来和平，那么这些数据就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核心。

附件3

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希拉里·贝克尔斯爵士的发言

由于许多极其重要的原因，今天显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们都渴望一个人类以最佳状态生存的未来。我们准备实现这一未来。我们所拥有的现代世界在形成之时装有许多进步思想，但同时也受到许多全球不人道行为的困扰。这些不人道行为的后果继续快速扩散，在全球破坏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最合理的修正行动。

我用加勒比之声发言，这一声音几经打磨，但已摆脱500年现代社会危害人类罪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加勒比是西方帝国战争和竞争性军国主义的主要全球战场。但这一加勒比地区已经转变为和平和稳定的区域，本地区实现民主的方式是全球最佳做法的标杆。

加勒比地区从瓦解、被摒弃的殖民主义的废墟中建立，已经带着尊严崛起。事实上，我们的主席、尊敬的多岛屿国家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作为加勒比民主政治和治理的典型象征性人物，自豪地站在我们和全世界面前。

他以这种方式成为了世界上当选时间最长的自由国家民主领导人。加勒比决心将冲突的历史抛在脑后，成为后现代世界人类最自由的地区。它弘扬和促进全球旅游业，这实际上是最具魅力的行业，以最慷慨的方式促进人类发展。

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运动从这一尊重和宽容的空间诞生。我指的是针对奴隶制、暴力殖民和制度性种族主义遗留问题的补偿性正义运动。世界呼吁我们完成这一漫长而充满分歧的正义之旅。

我们知道，用了整个十九世纪才从世界上根除了传统奴隶制度。我们也知道，用了整个二十世纪才最终实现民主公民权和人权并消除大部分殖民主义遗留制度。

最后，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将成为社会和经济正义以及实现赎罪、和解和补偿的时代。这是现代史的必然逻辑。

二十一世纪将见证我们为补偿做准备。世界坚持加强和平与稳定，同时也呼吁弥合非洲人民及其后裔遭受的创伤。我们今天站在战场上，打击肆虐世界的传统黑人奴隶制和非洲殖民等暴力非人道行径。

这些经历的遗留问题使世界各国社会受到种族主义毒素的毒害。因此，世界希望铲除和摒弃这些破坏稳定的遗留问题。

在许多地方，西方世界企图将这些遗留问题的碎片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这一计划没有成功。世界上没有足够大的地毯来掩盖这段历史及其当代表现形式。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会在世界各地埋下不稳定和暴力的种子。加勒比和非洲及其侨民呼吁在补偿性正义的框架内实现和解与和平。

加勒比各国政府最近呼吁与欧洲各国政府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并解决这些持续阻碍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有害问题，以颂扬民主方法和思想。

补偿关乎发展，亦是呼吁实现和平与正义，使人类能够实现其最美好的命运。我呼吁联合国重新召开20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该委员会必须完成其工作。在补偿问题得到解决，使今天遭受伤害的人得以伸张正义、实现平等之前，这一任务不算完成。这是联合国通过的行动十年的必

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减轻非洲人后裔的持续痛苦,他们是暴力殖民的目标受害者。

先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进一步推动了二十一世纪的补偿运动,这些危机由气候变化、慢性流行病和全球经济领域中的其他力量造成,对努力摆脱殖民限制的脆弱国家和社区造成了破坏。我们谈论补偿性正义是为了实现和平。这是经历殖民主义破坏性后果的加勒比国家和其他社区的发展模式。

迄今为止,二十一世纪一直被描述为致歉的时代——致歉,却不承诺进行补偿。没有补偿计划的道歉是不诚恳、没有诚意的。加勒比世界自居为这项极有价值的事业——为伸张正义而进行补偿——的核心支持者。全球“黑人生命有价值”运动针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历史和持续存在问题,进一步表明了补偿性正义运动的政治和哲学合理性以及法律正确性。这是对全球公平的承诺。

在我们进入漫长的二十一世纪之际,补偿运动将会治愈后现代性问题。它将确保当代成为和平和稳定的时代,只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呼吁为那些继续遭受伤害的人伸张正义。

我是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副校长。现在,我校已经为本地区和全世界服务了将近75年,并主动担当这场补偿性正义对话的中间人和谈判者。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主席、非常尊敬的拉尔夫·冈萨维斯阁下在他向世界发表的许多讲话中为这一对话和谈判提供了哲学框架。

世界将加速前进,迎接全球命运,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道路必须由补偿性正义运动来铺设,因为如果没有补偿性正义,这趟旅途将会是不愉快、不舒适的。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确认对奴隶运动进行补偿,帮助世界前进并走出这些历史犯罪现场。

此外,我们呼吁安理会在人类最美好的时刻在这方面给予其帮助。对补偿性正义的呼吁正在与对消除多种不平等的要求相融合。

附件4

巴基斯坦常驻代表兼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穆尼尔·阿克兰的发言

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就当代冲突驱动因素这一及时议题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首先,我谨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

联合国会员国赋予安全理事会的权力载于《联合国宪章》,而《宪章》在提出集体安全概念的同时,还在第五十五条中提出平行的目标,以创造“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和平与稳定的条件。这些目标包括较高的生活水准,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步和发展条件;解决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普遍尊重人权。

《宪章》第六十五条尽管很少被注意到,而且从未被引用过,但并非不重要。它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向安全理事会供给情报,并因安全理事会之邀请,予以协助”。《宪章》的制定者清楚地设想,联合国将集体维护和加强和平,并创造“和平与稳定的条件”。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了集体经济安全的本质。他说:

“经济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因此,每个国家的经济健康都会适当引起所有远近邻国的关切。只有通过富有活力和稳健扩展的世界经济,才能把各国的生活水准提高到将使我们未来的希望得以充分实现的水平”。

在《宪章》通过以来的75年里,联合国会员国未能实现联合国的构建者所宣告的集体合作安全理想。可以提出几个原因来解释这一失败。

第一,冷战侵蚀了普遍合作安全愿景。世界实际上分成了对立的阵营。马歇尔计划恢复的只是与美国结盟的欧洲以及后来还有日本。

第二,快速的非殖民化进程并未完全消除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和思维模式。非殖民化进程留下了不平等的后殖民社会及其对前殖民国家的持续经济、贸易和政治及军事依赖。1945年后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结构和机构反映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尤其是在最强大的国家,国家权力被重商主义利益集团攫取,这种集团看中的是利润,而不是公益及《宪章》所述的集体经济安全愿景。

长年下来,结果就是,这个世界与联合国创始者所憧憬的世界迥然不同。秘书长在今年早些时候缅怀纳尔逊·曼德拉的讲话中指出:“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26个最富有的人拥有世界一半的财富就是不平等。

安全理事会议程所列的一大堆冲突和争端中,许多乃至多数的起源可追溯到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些冲突的根源有很多,从内部各方争夺稀缺资源,到外部势力争夺宝贵的自然资源,并进行干预,旨在镇压各国人民为重新掌握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不胜枚举。在这个世界上,强权高于原则;弱者的声音遭到钳制和打压;强者即使严重违反《宪章》的基本原则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严重侵犯人权,也不会受到惩罚;《宪章》所要求的国际合作逐渐消失。

正是在这一不平等的情况下，世界遭到了1916年以来最严重大流行病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的打击。世界经济预计将收缩5%至10%，具体数字要看这一病毒何时能够得到控制。同平常一样，最贫穷的国家和最贫穷的人民将遭受最大的痛苦。有一亿多人将再度陷入贫困。富国已经注入逾13万亿美元来刺激经济，而穷国仍在寻找办法筹集所需的2万亿至3万亿美元来维持经济运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失去了收入，背负着无法偿还的债务，它们除非获得帮助筹到这笔钱，否则便可能面临经济崩溃。这将造成混乱蔓延，并进一步加剧区域冲突和全球紧张。

早在4月份，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呼吁全球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5月份，秘书长与加拿大总理和牙买加总理一道启动了及时的发展筹资进程。该进程确定了260个行动选项。但迄今为止，那些有能力执行这些选项的人作出的反应力度极小，令人失望。

国际社会必须调动政治意愿来执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选项：暂停处境危急的低收入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偿还债务，直到这场大流行病结束；取消最不发达国家所欠的债务；重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包括通过高效的债务回购和互换这样做；从多边开发银行获得大量净流入；通过国际开发协会和其他来源大幅拓展优惠融资；富裕国家履行承诺把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私营部门参与暂停偿债和减免债务，包括通过降低发展中国家贷款利率的机制这样做；以及最重要的是，发行新特别提款权，把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配额转用来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秘书长指出，这场危机为“重建得更好”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目标提供了机遇。其他人也喊出了秘书长的这句口号。然而，我们除非应对和纠正导致我们陷入目前和以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结构性不平等，否则便无法实现这些至关重要的宏伟目标。

结构性改革将需要包括金融架构改革，才能增加发展中国家获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充足资金的机会；建立包容、公平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机制；制定对发展中国家优惠的银行规章；建立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制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动；建立新的民主贸易制度，以扭转主要经济体强加的限制性措施，恢复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制度，并把可持续发展目标摆在贸易目标的核心位置；每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基础设施进行至少2万亿美元的投资，并为发展中国家获得最新技术提供优惠，尤其是弥合数字鸿沟。

我们除非能够调动政治意愿来实现这些公平和包容的发展目标，否则便不可能同意采取必要的雄心勃勃的集体行动来避免气候变化构成的生存威胁。发展中国家如果一穷二白，为经济生存而挣扎，就无法实施绿色新政。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在明年4月的发展筹资论坛和明年7月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尝试推进这些必不可少的行动。

至关重要的是，在《联合国宪章》通过75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再次让《宪章》所述的集体经济安全愿景沦为空文。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的福祉和生存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依赖于彼此的行动和决定。

我们忧心地看着，即使在人类面临生存挑战的这个时代，不容忍、仇恨言论、仇外心理和仇视伊斯兰教等现象仍有所上升。仇恨和暴力循环会破坏稳定，并造成社会和国家分裂。它有可能破坏对于集体应对这些多重挑战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我们必须重视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10

月29日发出的关于相互尊重的呼吁。如他所言,在行使表达自由时,应当充分尊重所有宗教的宗教信仰和信条。

最后,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扭转最强大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争斗和正在发生的新的致命军备竞赛。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区域紧张局势将更加严重,冲突将变得难以对付。没有人能够排除全球军事冲突的危险——而成立联合国正是为了预防这种危险。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不应加入新的政治集团和联盟,而是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大国冲突并制订彼此接受的方式,就人类面临的安全、发展、气候和其他共同挑战恢复合作。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联合国是唯一普遍接受的工具,能够让会员国处理当代冲突的驱动因素。我们必须依靠秘书长的远见卓识和勇气,规划一条明确而大胆的道路,以应对我们同时面临的多重挑战。联合国系统如果动员起来,就有能力支持这项追求全球和平与安全、追求公平和包容性发展以及早日顺利迈向可持续的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壮举。

附件5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贡萨尔维斯的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和人民作此发言。首先，我感谢各位代表迄今在本次讨论中的建设性参与，并期待他们在我们担任主席期间继续给予支持。

冠状病毒病（COVID-19）暴露了全世界的脆弱性。多边制度基本上未能解决的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因为我们的全球生活、生计和生产都因本次疫情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和调整。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变本加厉，对公共机构和民主规范的信任受到侵蚀，族裔和族群间紧张关系升级，人道主义运输受到干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其他人类安全关切增多。

除了COVID-19的影响，各国也因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以及登革热之类人畜共通病相应增多、大规模流离失所现象愈演愈烈、跨境恐怖主义继续扩散、粮食严重无保障状况升级和其他当代挑战而陷入窘境，这些挑战相互交叉，相互关联，同时在各国内部、经济、政治和安全系统内传播。

这些同步发生的系统性混乱无法在彼此割裂的情况下获得有效解决，也无法单凭军事手段得到彻底解决。我国代表团欢迎通过例如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之类前瞻性改革，将政治解决放在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的首位，从而努力提高安全理事会所有授权行动的成效和效率。我们着重指出，这些努力应当始终取决于受影响国家及其民众的需求、利益和优先事项，而不是取决于受狭隘市场算计制约的预算压力。

采取简单化做法将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视作按部就班完成的渐进式活动是不够的。相反，必须采取一种全面和一致的做法，动员整个多边体系来解决不安全的根源。为此，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强调，必须同时谋求维持和平、缔造和平和建设和平，以此作为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统一体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提供适足的资源来改善生活和生计，同时加强国家在政治与和平进程上的自主权。社会包容和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些是建立持久和平所需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稳定关系的重要成分。

我们联合国的道义宗旨是确保所有国家和人民享有自由。在全球人民遭遇的广泛和不断扩大的卫生、经济、人道主义和安全挑战中，我们必须迅速改弦易辙。我们必须大胆采取步骤缓解人类苦难，特别是在受冲突蹂躏的地区。我们无法以谨小慎微的步伐跨越裂谷，相反，我们会坠入我们脚下不断扩大的鸿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坚信应当采取全系统的方法，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主要机关加强合作，海地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例证。我们必须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大会更加紧密地合作，确保海地问题持续得到重视。

我们欣见建设和平委员会发挥关键作用，召集国际社会中的一系列伙伴，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帮助成员国推进它们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

尽管COVID-19给后勤工作带来挑战，建设和平委员会仍然继续努力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定期举办互动式对话，这证明了建设和平委员会

的价值。我们赞扬秘书长的建设和平基金提供极为重要的财政支助,但是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这一不可或缺的工具仍然严重缺乏资金。因此,我们敦促各捐助国和国际私营部门向这一机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我们还鼓励发达国家信守其官方发展援助承诺;通过优惠贷款和速效项目,向受冲突影响地区提供更大的援助;树立和完成雄心勃勃的抑制排放目标并为气候适应和缓解工作提供更大支持,以缓解脆弱环境中因气候引发的安全风险。最后,我们敦促各国撤销它们对弱国实施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和歧视性限制。这些行动是非法的,也是不人道的,它们损害全球合作和国家自主权这些保持和平的最基本原则。

当代的紧迫挑战不会在一夜之间获得解决。我们需要稳妥的手段和创造性思维,我们既要动脑也要用心。但是,通过重振多边主义,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地照顾各会员国的需求和观点并尊重国际法恒久原则,就有可能实现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迈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之际,要努力确保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和繁荣。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将人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附件6

突尼斯外交部长奥斯曼·杰兰迪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首先,我要真诚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理会主席并祝愿它圆满完成这项工作。在此,我欣然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贡萨尔维斯先生阁下就这一重要议题召开本次会议。

我欢迎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与会。我谨重申,突尼斯赞赏联合国系统应对当前挑战的努力,我感谢其他通报者的宝贵发言。我还要至为感谢俄罗斯联邦圆满主持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

预防战争、化解冲突、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场所,是创建联合国的最重要理由。现在,我们正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过去70年来,联合国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将继续通过其各机关,主要是安全理事会,发挥这种作用。

虽然联合国的努力使人类免于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并成功地恢复许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当今世界继续面临对安全、和平与稳定构成的诸多挑战和威胁,既有直接、常规的威胁,也有间接、新奇的威胁,在各地区和许多方面,这些威胁愈加严峻。

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事态发展催生了新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和冲突的肇因具有多重和交错性。当前的主要因素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团体作为冲突一方出现及其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相关联;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生计,由此对千百万人的粮食保障构成威胁,从而加剧暴力和冲突的根源;以及网络犯罪抬头。

流行病在全球范围蔓延,连同造成脆弱性的其它根源,特别是治理不力、侵犯人权、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和差距日益拉大,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持续存在贫困和排斥现象,对全人类构成威胁。

这些因素大多范围广泛,其影响涉及多个层面,而且相互助长。它们直接破坏和平与安全,引发冲突,在加剧和延长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冲突后局势以及恢复稳定和建设和平的进程产生直接影响。

有鉴于此,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及其对健康、经济、社会、安全和政治的毁灭性影响,是这些新威胁和挑战可能在各个层面对安全、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绝佳证据。因此,必须重新评估用于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做法和手段。

因此,鉴于这种流行病开始蔓延并成为一种大流行病,突尼斯呼吁采取一种以广泛和有效的国际团结互助为基础的新办法,并建立由联合国主导的新机制,以利于采取行动,顾及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需求和境况。

突尼斯赞同秘书长呼吁实行紧急全球人道主义停火,以便将国际努力的侧重点放在这一大流行病上。我国介绍了第2532(2020)号决议,其中提出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全面、协调一致对策。该决议是突尼斯和法国的一项倡议,于2020年7月1日获得一致通过,是国际社会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所做努力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成功地团结安理会成员,巩固了它们共担责任、推动立即结束世界各地冲突的愿景。

我国正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努力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和整合联合国各机构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和其它挑战的对策,使各国和各国人民愈加坚韧,遏制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促进和平与安全,并为所有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平与安全构想不再单单适用于冲突;除解决冲突之外,它们现在还包括预防冲突、解决其根源以及加强人的发展指标、经济福祉、粮食保障、社会安定、善治、民主、人权、法治及体制效力。另外还必须遏制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趋势,减少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影响,控制和遏制医学和生物因素造成的大流行病的蔓延。

为此,我们呼吁建立一种新的集体安全构想,从而考虑到新威胁的诸多层面,并有助于制定应对和减轻这些威胁的适当战略,当然也要确保联合国的努力符合巩固安全与稳定的任务,促成愈加高效的实现和建设和平体系。

最后,突尼斯重申,我国致力于多边行动和促进集体安全构想,并认同人类命运与共。我国要求加强国际努力,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从最广泛的角度应对一切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新老挑战。此举将使建设和平进程卓有成效,巩固稳定的基础,结束冲突和人道主义悲剧。

我们坚信,全球稳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工作;帮助秘书长提高联合国系统应对挑战的业绩;以及加强联合国系统跟上全球变化步伐,把握全面的和平与安全观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能力。不可否认,这是全体会员国的共同责任,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尤为如此。

附件7

比利时发展合作和城市政策部长梅里亚姆·基蒂尔的发言

如果说2020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那就言之过轻。在世界各地，冠状病毒病（COVID-19）感染率激增。最近的可悲事件提醒我们，恐怖主义和教派暴力这两股邪恶势力仍有根基。

野火烧毁澳大利亚、巴西和加利福尼亚的大片土地。各地沿海平原和岛国被淹没的风险越来越大。缺水和降雨模式失常致使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并严重影响生计。今年，大西洋飓风季节来势汹汹，以至于已经没有名字来来命名每场风暴了。

大规模气候事件造成流离失所、经济衰退、粮食无保障及社会不满情绪。众所周知，这些情势是脆弱性的根源，为不稳定和动荡提供了沃土，并且使年轻人易于被武装团体招募。

许多冲突都有更常见的政治根源，爆发前酝酿已久。气候变化等新威胁与和平面临的较为传统威胁有着共同之处，即：它们并非凭空发生。一如气候事件可能是不稳定的因素，不公抑或法治和国际标准遭到破坏也可能是不稳定的因素。剥夺人权往往是出现紧张局势的前兆。当然，其结局并非总是像我们今天在叙利亚看到的那种公然无视国际标准的情况，那样，但却往往如此。

及早行动是要防止新发冲突，避免旧有冲突死灰复燃。安全理事会应该有计划地提防紧张局势和安全风险。正如秘书长今年年初恰如其分地表示的那样，我们在维护和平方面投入的精力仍远远大于预防冲突。与气候相关的事件、大流行病、不公现象加剧、经济和粮食危机、严重侵犯人权或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等，都可产生风险。

在这方面，我们鼓励秘书长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赋予的权利，“得将……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例如，第2532（2020）号决议请求秘书长向安理会通报COVID-19在安全方面造成的影响。气候安全机制调集联合国系统各渠道现有的专长，并将其提供给安全理事会。可考虑对其它新发威胁采取类似的举措。比利时在任期内主张就专题问题进行前景扫描通报。

但是及时掌握必要的信息还不够。归根结底，及早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有多么重要，要看安理会是否愿意讨论提请其注意的问题，以及是否愿意尽早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今天的危机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安理会也不应该在真空中运作。因此，比利时作为当选成员，一直推动安理会采取全面的预防性办法。确实，安全理事会需要以积极主动的方式促进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与其伙伴进行协调，支持早期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强调区域性联合国任务授权的关键重要性，如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以及秘书长大湖区问题特使办公室的任务授权，也强调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的协调作用。

要实现可持续和平，我们都必须确保我们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三个层面的行动成为一个协调一致办法的组成部分。作为比利时新任发展合作大臣，我将通过解决危机和冲突的根源，协调一致解决民众的

的脆弱性问题以及在危机之前、期间和之后提高他们的复原力, 对这一联系给予特别关注。

我们应始终优先考虑预防, 尽一切可能投资于发展, 并在必要时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支持人道主义行动。尊重人权应该是所有这些干预措施的核心。今年10月, 联合国成立75周年是反思我们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共同取得的成就的时刻。现在, 我们必须着眼于我们的集体未来。安全理事会为了子孙后代, 也为了其自身继续与时俱进, 必须全面履行其任务授权, 以确保一个和平的未来, 并确保没有任何人掉队。

附件8

爱沙尼亚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斯·伦杜先生的发言

主席女士，我感谢你组织今天的公开辩论，我们对此高度重视。爱沙尼亚历来主张并促进预防、冲突后恢复和维持和平举措。预防冲突尤其是爱沙尼亚在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的核心工作，也是其在联合国总体工作方针的一部分。

这包括爱沙尼亚自2013年以来一直通过建设和平基金，自2017年以来通过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为建设和平做出贡献。我们肯定建设和平基金以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在预防冲突、监测以及评估世界各地政治事态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国际社会开展努力的同时，我要强调当地自主权的重要性。要使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活动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各国政府和当地社区的政治意愿和支持。建设和平进程需要包容各方，同时考虑到当地和平建设者的看法，特别是妇女和青年，他们往往是受冲突影响最大的群体。

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实地协调。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改进各种行为体在国内进行的协调，这些行为体有时为数众多，涵盖人道主义和发展合作以及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各类行为体。全面施策将有助于各国社会变得更加强大，有效解决冲突的根源。如果根本的、往往是长期的不满得到积极解决，人权得到尊重，社区就会变得强韧，过渡期正义就会得到伸张，和平就可以持续。

发展与和平相互交织。一方面，激烈的武装冲突使得能够用于使国家摆脱冲突的发展举措的资源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没有多少手段确保安全的国家可能面临更大的暴力冲突风险。在这方面，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的严重性被低估。必须强调，气候变化加剧了冲突和脆弱性的重要驱动因素，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构成挑战。

爱沙尼亚在刚刚重获独立之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很早就认识到投资于技术和数字领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这种方法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个更透明、更信任和更高效的社会。

今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占据了所有头条新闻，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令我们许多人担心自己的健康、生计和亲人的安危。正如我国总统柯斯迪·卡留莱德女士阁下在9月份安全理事会关于COVID-19问题的公开辩论中所说的那样：

“技术发展这一领域有助于世界保持一致并继续相互合作。”(S/2020/953, 附件三)

对于那些希望飞跃进入新时代的国家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数字解决方案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给每个国家带来更大的繁荣。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意愿，这将很困难，此外，没有什么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近30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同样的目标，这项工作仍在进行。

发展数字社会和电子政务只是推动任何国家取得发展成就的一个可能途径。爱沙尼亚的经验表明，这一办法不仅有效，而且非常有效。就我们而言，

我们一直并将继续对数字革新倡议方面的合作持开放态度,愿意与那些渴望迈出下一步的人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附件9

德国联邦外交部国务部长尼尔斯·安恩先生的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别是冈萨维斯总理,召集本次重要辩论会,讨论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在今年7月德国担任主席期间,我们将两个相关议题——流行病与安全以及气候与安全——放在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重要位置。我们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通过今天这场适时的公开辩论会,使预防冲突和可持续危机管理重新回到安全理事会议程上。

正如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阁下和各位通报人所强调的那样,今天的冲突是由复杂、多方面的挑战驱动的,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协同努力。这一工作必须包括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必须系统和切实地审议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不发达和侵犯人权行为对安全的影响,如若不然,我们将无法实现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期望我们实现的目标。

我相信,参加本次虚拟会议的每个人都认识到,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与我们在二十世纪中叶面临的挑战不同。我们要想履行我们的责任,就必须跟上这些发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将程序和传统强加于现实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可能起作用,但是,安理会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在和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打交道。安理会若要继续与时俱进,就必须担负起责任,最终处理世界期望它处理的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所有其他紧迫全球问题的安全影响。采取全面办法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意味着需要消除问题根源和预测中长期挑战。我们必须更加努力,争取找到综合性办法来应对相互联系挑战。我们必须作出更多努力,加强预防危机、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工作。

我发言将着重列举当代冲突动因的三个具体例子,即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侵犯人权行为,来说明这一点。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继续在全球各地肆虐为患。这项多层面挑战严重影响卫生、人道、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因此,它加剧受冲突影响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不安全状况,并损害这些国家的建设和平努力。

这场大流行病给安全造成的影响非常明显。7月份,安理会在第2532(2020)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十段中明确承认,这场大流行病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并可能使建设和平成果倒退。我们应作出更多努力来贯彻落实这项决议。

正如常务副秘书长早些时候在发言(附件1)时所阐述的那样,面对这场大流行病,整个联合国系统都在继续进行调整。我们欢迎这种努力,并鼓励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充分说明这场大流行病给安全造成的影响。这种报告将支持预防和预警,后者对于安理会的工作至关重要。

COVID-19疫情造成巨大的直接社会经济影响。它给脆弱的冲突后环境中的民众造成格外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确保为人道主义、发展、预防和建设和平努力提供更多支持。建设和平需求已经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尽管预防危机的成本比危机发生后予以应对的成本低得多。秘书长建设和平基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根据COVID-19疫情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调整了工作和项目。我们仍然是该基金主要支持者之一。然而,这还不够好。我们必须设法确保为预防危机和建设和平提供可靠和可预测的资金。

气候变化无疑是当代稳定与安全面临的最现实威胁之一。2020年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世界各地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一情况对安全造成的影响。从萨赫勒到加勒比再到太平洋中的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正在威胁各国的稳定、安全，在某些情况下还威胁各国的生存。

安理会一再讨论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今天的通报再次表明，在二十一世纪，气候变化是冲突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来提高我们对这一层面的冲突的认识。

我们鼓励秘书长将冲突所涉及的气候问题纳入其报告，并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利用所有可用的正式和非正式论坛为加强向安理会提供信息作出贡献。安理会一些成员正在召集的非正式专家组是争取把气候与安全扎扎实实地列入我们议程的重要步骤。

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冲突形成恶性循环。这一循环增加了暴力冲突、流离失所和随后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风险。我们在世界不同区域都看到了这一点。在萨赫勒地区，这一点最为明显。两周前，德国与联合国和丹麦一起召开了关于向萨赫勒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问题的会议。虽然我们对认捐超过17亿美元感到高兴，但人道主义反应只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只有当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行为体共同努力消除冲突根源以及中长期影响时，我们才能希望建设和保持和平。

受冲突伤害最严重的总是最弱势者。在当代冲突中，最弱势者的人权最有可能遭到侵犯。在这场疫情中，性别平等成果有可能丧失，因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挪用原本专用于支助妇女和女童以及支持她们参与和平进程的资金。通过妇女和平与人道主义基金，德国支持建立了“应急窗口”，并为地方妇女组织提供了250万美元，以支持这些组织度过危机。

危机和冲突，不论其动因是气候变化、大流行病还是发展不足，都涉及到性别问题，联合国全系统的对策需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这一对策，包括安理会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并力求启动具有包容性，让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妇女、青年和被边缘化群体充分切实参与的政治进程。这样做，我们就能为建设强韧的社会作出贡献，这种社会能够更好地抵御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努力实现发展。

最后，我谨强调建设性协作——会员国之间的协作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支柱之间的协作——的必要性。安理会需要采取具体步骤。我们应进一步授权并鼓励建设和平委员会向安理会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建议，因为建和委在联合国系统内拥有独特的任务授权，能够采取跨支柱的综合办法。

我们需要确保联合国及其驻实地机构，尤其是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有充分的授权和足够的工具来应对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侵犯人权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后果。我们应把这些复杂的安全挑战扎扎实实地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并与其他支柱合作，全方位应对这些挑战。这些要求少一点都不行。

附件10

俄罗斯联邦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先生的发言

[原件:俄文]

我非常荣幸地宣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就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主题——“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当代冲突与不安全的驱动因素”——准备的发言。

“首先,我谨就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一事,向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表示祝贺。主席先生,此事不仅对于贵国,而且对于所有其他小岛屿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安全理事会,我们必须听到这些国家的独立声音。

“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主题反映了许多国家的关切,在目前的艰难情况下,这些国家正面临复杂安全威胁上升之势。在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面临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这一新挑战时,重点讨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这场大流行病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国家都残酷无情。它证明了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教训,那就是,除团结、合作、负责任地行事和互助外,别无选择。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采取这一做法。有些国家继续优先考虑本国的一己之利。它们日益广泛地采用单边制裁的做法,阻碍其他国家努力抗击这场大流行病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在这方面,我们谨再次表示,我们声援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包括解除或至少放松非法的限制性措施的呼吁。鉴于目前的情况,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建立绿色走廊、消除贸易战和制裁的建议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确保弱势群体获得基本必需品和药品。

“在从冲突向可持续和平过渡过程中面临艰苦斗争的国家特别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在提供这种援助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根据各国社会的需求和要求制定和实施建设和平战略与优先事项主要是各国自己的责任。每个情况都需要一种特殊、独特的方法,而不是强行采用一成不变的一刀切办法和政策处方。

“这也适用于预防危机的努力。令人震惊的是,一些人越来越频繁地试图制定普适的冲突指标,这为滥用和干涉他国内政创造了机会,目的是向所谓令人反感的政府施压。

“我指的是有人企图把侵犯人权说成危机的主要前提。我们认为,武装冲突的成功解决和冲突各方的和解为改善人权、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解决环境和其他问题奠定了基础。

“我们不否认这些问题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联系。然而,我们所持观点的前提是,经济问题不会自动引起不安全,反之亦然。此外,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是,通过联合国主要机构之间的分工,每个机构都必须严格按照其任务规定履行职能。

“例如,这适用于安全理事会关于气候议程的讨论。我们不认为气候变化是导致冲突和全球不稳定的普遍潜在因素。在这方面,它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影响必须按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在该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拥有适当专门知识和工具来起草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决定的相关联合国机构。我们完全同意小岛屿国家的朋友们的关切,并打算通过国家发展机构和得到普遍公认的国际机构,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积极帮助它们适应气候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支持联合国各机构在得到所有会员国同意的适当情况下开展合作、汇集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它是帮助各国根据其优先事项制定冲突后恢复战略的咨询平台。我们主张发展和加强与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对话。

“我再次感谢主席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呼吁注意当前的挑战和安全威胁。我深信，坦诚、公开地交换意见将促进有效寻找应对这种极其紧迫的问题的方法”。

附件11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副部长阿尔文·博特斯先生的发言

主席先生,在贵国成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历史性时刻,我要祝贺你首次主持安理会。南非感谢你决定与安全理事会的非洲成员进行协调和密切合作,这促成了历史性的安全理事会非洲成员加一(A3+1)的建立。这种伙伴关系加强了南非的话语权,牢牢巩固了加勒比国家和非洲大陆之间的历史和文化纽带。主席先生,我也借此机会赞扬你对加勒比共同体的出色领导。

正如秘书长委任的一个独立知名人士小组最近关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报告所指出,今天的冲突是多层面的,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持续排斥、不平等和不满,包括难民流、境内流离失所和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溢出、治理薄弱和国家能力薄弱,并因气候变化、暴力极端主义和滥用新技术而雪上加霜。

(S/2020/678,附件二,第4页)

我们要感谢独立知名人士小组和秘书长强调冲突的这些当代驱动因素。在这方面,我们还要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当前第三次建设和平架构审查正式阶段的共同主持人新西兰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迄今完成的值得称道的工作。

安理会确实有必要组织更多关于社会经济和其他新出现的冲突驱动因素的定期讨论,以提高对其破坏稳定影响的认识,并促进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在我们考察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时,必须理解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的影响。事实上,我们赞同和平与安全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些艰难应对武装冲突的国家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因为它们的机构和治理能力已经不堪重负。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冲突的当代驱动因素如何导致冲突和长期不安全。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正在竭力摆脱不发达的国家也在竭力维护自身安全,并且可能特别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族群间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影响。

2020年,我们看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给解决冲突、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增加了又一层复杂性。我们认为,COVID-19、气候变化和其他这种全系统的社会和生态压力应激励联合国及其伙伴更加密切地合作,包括与国家和当地的建设和平人员合作,以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集体能力和资源,并将其努力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方。

干旱、缺水、粮食不安全和荒漠化,以及被认为是由气候变化造成或加剧的暴力和不规律的自然灾害,增加了暴力冲突的风险。有证据表明,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以及非洲之角和加勒比一些地区就是这种情况。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候压力是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它们对稀缺资源造成进一步压力,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和冲突。

关于气候行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以及其他1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全人类有效追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本原则——即减贫——仍然至关重要,具体是通过不让任何人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掉队,并首先帮助落在最后的人。

为了减轻冲突与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的影响,我们必须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密切合作,消除不发达的根源,并借鉴安全理事会解决冲突的经验。显

然，必须采取全面的办法来应对威胁和风险倍增因素的影响，因为它们会加剧紧张局势和冲突。

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其他联合国组织和进程以及非洲联盟等相关区域组织密切合作。这些合作将确保安全理事会能够获得关于冲突与不安全当代驱动因素的潜在影响的信息。

安全理事会及其姐妹联合国部门和机构以及相关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行动，将为我们提供最佳机会，在争端发生前管控争端，在冲突爆发时解决冲突，并在解决冲突后通过建设和平措施来管理后续不稳定局势。

附件1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负责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的国务大臣、温布尔登的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的发言

主席先生，谢谢你。各位来自伦敦的人士，下午好。主席先生，你是联合王国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

我们在安理会，当然还有在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两项重要决议——其案文获得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非常专业的指导——之前开会，确实切合时宜。

首先，我还要感谢三位通报人——易卜拉欣·马亚基、希拉里·贝克尔斯爵士和穆尼尔·阿克兰先生。当然，听到常务副秘书长、我亲爱的朋友阿米纳·穆罕默德的专业见解总是令人振奋，她为今天的最新情况通报奠定了良好基调。

作为联合王国负责联合国和英联邦事务的大臣，我非常感谢各国与我们的密切合作，特别是在这些全球机构中。

虽然强权政治、侵略和压迫仍然是导致今天许多冲突的非常真实的因素，但我们正在日益认识到和平面临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冲突的当代驱动因素之一是排斥——将弱势群体、宗教少数群体和妇女排除在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之外，这种排斥直接导致贫困、绝望、暴力和极端主义。不难理解，努力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气候变化影响的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可能会加剧这些威胁。

事实上，2020年无疑证明了这一事实。这些压力使暴力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并有可能使来之不易的发展与和平成果倒退——特别是但不仅限于在最贫困的国家和那些已经受到不安全和冲突影响的国家。保持和平议程使我们大家认识到，必须要知道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不是独立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根据这一议程，我们已开始完善集体办法的同时建设和保持和平。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非常简要地谈三点。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保持和平的更广泛努力都很重要。第二，善治和包容是根本。第三，我们必须协调集体努力，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以便从一开始防止冲突发生。

关于我要说的第一点，气候变化创造了使世界各国冲突风险成倍增加的结构性条件。肥沃的土地遭到侵蚀，加剧粮食短缺和族群间紧张关系。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飓风和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整个社区和一些国家的生存。我作为英国海外领土事务部长，通过我们与加勒比的关系亲眼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解决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我认为即将于明年在联合王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商定真正一致的集体行动的良机。

关于我要说的第二点，我已经提到，排斥问题是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即使是发达经济体也容易受到冲击。如果大部分人口被边缘化，或者如果人权得不到尊重、维持当然还有加强，发展与和平的成果就有可能付之东流。我们要绝对明确：保护最弱势群体的权利——被社会排斥者的权利、少数族群的权利和女权——的国家更加强大。这些是进步的民族。所有权利都得到平等尊重，是国家强大和团结的标志。

强有力和包容的机构、尊重人权、有机会获得服务、健康的民主、法治和增强妇女权能,对于建设复原力和建设可持续和平都至关重要。

关于我要说的第三点,更好的分析提供更好的国内国际对策。国家利益攸关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的协调规划可以将预防工作作为重点并确保为其提供适当资源,包括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以更加协调的方式努力支持建设和平的目标。

在纽约,建设和平委员会日益显示出其作为各国和各组织共聚一堂,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目标的论坛的价值。这些办法对于更有效地预防冲突至关重要,必须为我们每个人所掌握。

安理会当然可以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它也有一项关键义务。在出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地方,我们不能只是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正如我们已经从其他发言者那里听到的那样,《联合国宪章》以及各项国际条约规定,各国负有义务尊重人权并遵守国际人道法。安全理事会有义务直言侵权行为的本质——对全世界基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最后,可以说,这一代人从未有过这么大的国际合作需要。确实,联合国可以在成立75周年之际颂扬其过去在建设、保持和加强和平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即安全理事会、联合国、联合国的定义者,必须向前看,看到我们在建设、保持和加强世界和平方面能够集体开展哪些工作。

附件13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怀忠的发言

我真诚地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阁下主持今天重要的公开辩论会。在联合国庆祝其成立75周年之际召开今天的会议恰逢其时,让我们思考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并加强我们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努力。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和其他通报人所作的富有见地的通报。

我们今天都知道,由于不尊重甚至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及在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关于各国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阐述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关于国家主权平等、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国际社会继续面临严重威胁和挑战。这些是紧张、冲突和对抗的驱动因素。它们表现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军备竞赛方面的复杂事态发展,以及随着海洋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日增,违反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行为。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是灾难性非传统安全挑战事件。

因此,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提出以下几点。

我们需要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树立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风气。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奉行最大限度的克制,支持秘书长呼吁的全球停火,并且遵守国际义务,以便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对话,实现持久解决。我们还呼吁解除对冲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计产生不利影响的单方面制裁。

应进一步加强多边主义,以联合国为国际合作的核​​心,协调会员国的利益和行为,并加强与其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安全理事会应在决策过程中保持团结,充分利用现有工具,特别是预防性外交和调解,同时着手改革联合国和平行动。

必须对解决冲突和不安全的根源给予应有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应对其后果。从预警和预防到和平解决冲突,从冲突后恢复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所有阶段都加强努力。应优先考虑保护平民,包括最弱势群体,以及处理炸弹和地雷后果和受害者援助。

同样,国际社会的协调努力必须侧重于经济强韧复苏、以人为本的方法、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及有效运作的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COVID-19大流行病和外部冲击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入帮助。

越南从一个贫穷的欠发达国家一个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度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珍视并将继续致力于做可靠的可持续和平与发展伙伴。我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其他成员一道,努力建设一个相互关心、支持和共享的东盟共同体——一个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东南亚——以及有利于睦邻友好、合作和繁荣的区域环境。越南随时准备与所有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合作,应对时代的挑战。

附件 1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的发言

[原文: 中文]

中方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 欢迎圣方倡议举办此次会议, 欢迎冈萨雷斯总理主持会议。我也感谢阿明娜常务副秘书长、经社理事会主席阿克拉姆大使、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首席执行官马亚基先生、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贝克莱斯爵士的通报。

和平与安宁是人类永久的期盼, 但冲突和不安全因素始终存在。进入21世纪以后, 从“9·11”事件到国际经济金融危机, 再到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人类经历了一次次全球性挑战的冲击, 现在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面对各种冲突和安全风险, 厘清其驱动因素, 对症下药, 有利于更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给各国人民以安全和安宁。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基础。加大发展领域投入, 切实消除发展赤字, 事实上是预防冲突最重要的工作, 是成本收益率最高的和平工程。

当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面临新的巨大障碍, 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国际社会应当增强解决发展问题的紧迫感, 全面、平衡、有力推进2030年议程的落实。应重点聚焦消除贫困, 防止全球减贫成果出现重大逆转。

疫情防控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 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加快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会员国应切实落实安理会第2532号决议, 积极应对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

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我们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宣布,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彰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和负责任态度。希望包括安理会全体成员在内的世界各国, 特别是发达国家, 都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 共同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

对冲突后国家而言, 筑牢可持续发展基础是一项关键任务。如果冲突结束之后发展仍长期陷于停顿, 和平就难以真正巩固。国际社会应当支持冲突后国家加强政府权威, 提升治理能力, 凝聚社会共识,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加强集体安全是实现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当今世界, 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挑战, 独善其身不行, 迷信武力更不行, 坚持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普遍安全才是正确选择。

国与国交往发生矛盾和分歧在所难免, 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任何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 不能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和平解决争端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人间正道。

要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搞任何排他性的“小圈子”。要警惕任何挑起集团对抗、制造“新冷战”的企图。穷兵黩武只能加剧安全困境，先进军备换不来绝对安全。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有义务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

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次表明，恐怖主义并未远去，国际反恐合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恐怖活动无论是谁发动，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予以坚决打击。同时，不应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宗教挂钩，更不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要积极采取去极端化举措，阻遏极端思想传播，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网络安全风险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各国亟需加强沟通协调，共商应对之策。任何国家都不能滥用“国家安全”理由，限制正常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与合作。中方日前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致力于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把网络空间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和平与稳定和人类福祉。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团结合作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有力武器。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

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多边主义必须得到维护，联合国作用必须得到加强。中方始终认为，无论大小国家，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各国应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安理会、联大、经社理事会、建和委等机构应各司其职，形成互补。联合国与区域及次区域组织也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冲突风险和不稳定因素。

大国对于维护国际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发挥表率作用。在世界面临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时刻，安理会应保持团结，避免陷入分裂。特别是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促进国际团结合作，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带头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作出贡献。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古特雷斯秘书长呼吁在年底前实现“全球停火”。实现和平靠等是不行的，需要我们采取切实行动。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广大会员国应该重申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承诺，朝着更加美好的共同未来再出发。

附件15

多米尼加共和国安全理事会特使何塞·辛格·魏辛格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我们感谢通报者, 并就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冈萨维斯总理表示祝贺。

今天的辩论会是及时的, 因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更加复杂, 具有跨界因素和全球性质。

《联合国宪章》强调预防具有核心作用, 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责任。多米尼加共和国本着这种精神对第八章作出了阐释。因此, 我们赞同多边主义, 认为它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该原则在今天特别有效, 因为抗击冠状病毒病(COVID-19)及其影响的唯一方法就是共同努力。

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对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种非常规威胁就是气候变化。它被称为人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和生计中断只是我们许多国家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影响中很少的一部分。

气候与安全的关系不可否认, 气候与发展与安全的联系也不可否认。因此, 安理会以及整个联合国必须寻求雄心勃勃、创新和共同的解决方案, 防止气候变化成为冲突的主要和最复杂的风险因素。它需要更高的目标、更强的行动和更大的成果。

不过, 我们认识到冲突根源是多方面和相互联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会影响稳定。公平获取用水已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 助长了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暴力冲突和不稳定的爆发。

有组织犯罪和贩运武器虽然不是当代才有的威胁, 但其实施手段非常狡诈, 超出了各国的应对能力。

人是今天所强调的各种问题的核心。这些威胁必须去政治化, 才能被视为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壮大人类的机遇。为此, 安理会必须承认, 比如说, 族群间暴力是造成人类苦难以及包括冲突中性暴力在内的当前侵犯人权行为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

保持和平始于保护民众人权免遭侵犯。在任何情况下, 侵犯这些权利都是和平的对立面, 是对我们共同人性的否认。人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不会有和平。

COVID-19等大流行病使系统性不平等、歧视和边缘化等导致暴力的根源因素浮出水面。在许多冲突地区, 感染COVID-19就等于是被判处死刑。6000多万人居住在不受政府控制的地区。谁来救他们? 我们必须与能够接触到这些民众的人道主义组织合作, 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包括为其提供疫苗。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 没有人可以安全。

所有这些因素, 无论是单独还是叠加, 都对平民造成严重后果, 并成为煽动和加剧暴力的武装团体增多的温床。

必须让妇女和青年等当地行为体参与进来, 帮助制定和领导各项工作, 才能提高认识并应对所有这些威胁, 减轻冲突, 防止暴力, 实现和平, 以及减轻不安全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联合国、我们所有人以及各种区域组织担负着应对这些威胁、并肩努力捍卫《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共同责任。

只有本着预防意识, 凭借多边主义和早期关注, 并在和平、人权、发展和人道主义等各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我们才能一体行动, 为最脆弱者带来实效, 避免冲突和不安全现象复发。

附件16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古拉·德里维埃的发言

[原件: 英文和法文]

我感谢所有通报人的通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请我们审视当代冲突与不安全的驱动因素。这是一次重要的辩论会, 因为虽然冲突的起因处于演变之中, 但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职责是不变的。安全理事会必须不断调适自己的行动和工具, 以完成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

我谨强调三点意见。

首先, 气候变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已多次承认气候变化对多个地区、包括乍得湖流域、索马里或马里的恶劣影响, 并呼吁更好地评估和管理相关风险。现在到了在我们的行动中采取一种预防性做法, 特别是预见环境灾害的人道主义后果的时候了。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希望秘书长能够就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每两年进行一次评估。

我的第二点意见是关于大流行病。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系统地预见其破坏稳定的影响。安全理事会在减轻冠状病毒病影响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呼吁立刻全球停火, 为抗击这场大流行病提供便利。必须不遗余力地加快执行安理会7月1日一致通过的第2532 (2020)号决议。

处于冲突中或冲突后局势下的国家尤其脆弱。因此, 保护人道主义空间、确保对人道主义和保健工作者的保护不可或缺。此外, 大流行病加剧冲突的深层起因, 特别是加深不平等, 并且偏重于影响最脆弱的人。疾病遏制措施还有可能导致信息操控和公众自由受到限制, 由此削弱对机构的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意见是, 我们必须保持对人权问题的警觉。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秩序以及排斥妇女和青年可导致暴力、民众流离失所乃至国家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遭到破坏。这并非什么新闻。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要求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授权维和行动保护平民, 并且协助国家当局加强法治、安全以及司法。我们建立了保护儿童、促进妇女充分参与和保护妇女、顾及青年以及打击贫困与有罪不罚的特定机制。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处理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我们支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定期通报情况, 就像我们定期听取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通报一样。我们可在遵守各自授权的同时, 加强与人权理事会的协同增效。最后,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与人权维护者互动, 特别是在安理会实地考察期间与人权维护者互动, 并在他们受到威胁时呼吁保护他们。

冲突还植根于发展和治理问题, 这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联合国必须采取一种统筹的做法, 把安全、人道主义以及政治行动结合起来, 同时还促进人权、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安全理事会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让我们集体迎击挑战。

附件17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钱宁的发言

我们荣幸地看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冈萨维斯阁下主持今天上午的这次重要会议。同为群岛国家，我们祝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本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主席任期内一切顺利，因为这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历史上首次担任安理会成员。

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我们的姊妹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和各位通报人的全面通报。易卜拉欣·马亚基先生、希拉里·比克尔斯爵士以及我们的兄弟穆尼尔·阿克兰大使为这场生动的讨论提供了充足信息。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前的大流行病加剧了许多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脆弱，有可能逆转建设和平工作。成员们可能记得，这正是8月份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期间举行的关于大流行病与保持和平挑战的公开辩论会（S/2020/799）的主要成果之一。

的确，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是多层面的，当代各种问题比如大流行病、环境与发展问题、保护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可使这些挑战更趋复杂。

加强多边体系从而处理冲突的根源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安全理事会的许多讨论中，我们常常听到要确保和平与稳定，就需要采取一种涵盖安全、人权和人道主义层面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做法。为此，作为主要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安全理事会应该继续把这种协调连贯的做法作为主线。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强调三点意见。

首先，必须强化国家的能力。确保国家的存在切实有效，保护民众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抗击贫困与不平等，这些对于可持续地打破冲突循环至关重要。

建设并提高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机构能力刻不容缓，从而营造有利于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以便国内各种利益攸关方能够采取全面的做法，处理冲突的根源。这必须包括对国家预防冲突的能力进行投入。应继续把它作为联合国特别政治特派团和维和行动的优先任务之一。

我们还必须确保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特派团为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国家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地方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因为它们更了解有待处理的冲突风险。我们还需要国际利益攸关方提供伙伴合作、资源并且分享经验。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各方面工作的协同增效。联合国的应对必须协调连贯，利用其各个机关的优势。依据明确的路线图开展分工与协调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从气候变化到粮食安全，眼前的当代安全挑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为解决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包括交流信息和动用专门知识和能力。

作为预警系统的一部分，联合国在实地的特派团有能力监测和查明冲突的驱动因素。同时，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具有处理具体冲突驱动因素的

技术能力。安理会需要与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以及专门机构协同努力，以找到解决这些新挑战的办法。

建设和平委员会也在协调联合国各主要机关和其他机构的对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动员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

第三，我希望突出强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作用。一个区域里的国家往往面临类似的挑战。这些挑战有时也具有跨界和相互关联的性质，需要区域内各国大力合作。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拥有深厚的知识、独特的视角和强大的地方联系，对于支持各国建设持久和平至关重要。应当利用这一潜力来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并共同解决冲突和不稳定的驱动因素。正如我们经常重申的那样，我们认为，邻国最了解情况。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也应分担责任和分享经验。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努力。

最后，我要引用一句全世界包括加勒比地区都知道的古老谚语：“知足的种子长出和平的果实”。和平的到来离不开艰苦的努力。

没有任何一个行为体能够单独彻底解决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但是，为了能够共同努力，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如果没有发展——从地方社区到国家再到国际一级的发展合作——我们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和平将更难实现。

附件18

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阿巴里的发言

[原件: 法文]

我谨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历史性地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今天的辩论会是一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无数危机, 其中许多危机是相互关联的。鉴于全球安全面临的新的非常规威胁, 我们全球社会要采取新的办法, 以便更充分地处理新出现的危机。

首先, 确保和加强可持续和平的最佳途径之一是投资于公平发展, 特别是在脆弱国家。在被确定为脆弱国家的58个国家中, 大多数也是受冲突影响的低收入国家。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 到2030年, 80%的最贫穷国家将处于脆弱局势中, 这也使它们更容易受到不安全和危机的影响。脆弱局势的特点是危机交织, 这些危机也会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因此, 在以冲突和不稳定为特点的脆弱局势中, 以及在某些国家的人口压力增加的情况下, 发展投资尤为重要。例如, 一些研究报告将贫穷和文盲与激进化联系起来。恐怖主义在贫困的温床中茁壮成长。失学青年被“博科圣地”组织等武装恐怖团体招募的风险要高得多, 而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女童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风险更大。与生活在未受影响国家的女童相比, 她们入学的可能性也有一半。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地区, 受教育的机会变得更加重要。没有教育, 已经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儿童将面临一个没有真正机会或可能性的未来。

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是气候变化。除了粮食无保障和环境退化外, 气候变化还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 造成了包括助长冲突在内的灾难性后果, 从而破坏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 同时加剧了人道主义需求。例如, 在乍得湖盆地, 不安全、贫穷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已是确凿无疑。萨赫勒地区被认为是与气候有关的冲突的最明显例子之一, 这些冲突也影响到迁徙和被迫流离失所。

在乍得湖地区, 由于武装冲突, 近1000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仅在迪法地区就有10多万人流离失所, 近25万逃离尼日利亚的难民生活在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边境地区以及萨赫勒中部地区的其他地方。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加深, 加剧了人民生计的不稳定, 使他们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

因此, 应对这些风险将有助于保障和维护稳定。尼日尔正在与一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小组合作, 以确保更系统地考虑到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必须继续作出这些努力, 以便考虑到与性别有关的冲突因素, 因为妇女和女童面临特别的虐待。

综合办法不仅会使我们的干预措施更加有效, 而且还可以帮助减少未来危机的再次发生。它还将更有效地处理一个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严重不平等的世界。换句话说, 与气候有关的安全威胁既是一个地方问题, 也是一个全球问题。

今天, 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加强了这样一种理念, 即集体行动至关重要, 多边主义必不可少, 对新出现的全球问题采取跨部门的办法是找到可持续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在这场危机之后, 我们应该让世界重新致力于真正和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正如尼日尔共和国总统阁下在9月的高级别会议上所回顾的那样,全球大流行病凸显了重新思考我们集体安全的紧迫性(见A/75/PV.8)。我们大家有责任共同努力,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并考虑对我们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不可或缺的改革。今天的辩论会是这些必要反思的一部分。尼日尔坚信,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许多威胁,不是靠个别国家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靠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

考虑到上述几点,我国代表团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必须更好地认识安全威胁相互交叉的性质,包括通过严谨的分析这样做,这些分析可以提供关键信息和数据,使我们的工作和干预措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

第二,必须填补干预措施的资金缺口,这些措施将共同应对受冲突和脆弱局势影响地区所面临的安全和发展问题。

第三,鉴于许多危机超越国界,必须支持和加强区域组织的作用。

最后,我们必须把人置于我们干预和考虑问题的核心。加强妇女和青年在建设和平中的作用和参与也很重要。

附件19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特的发言

冈萨维斯总理, 我感谢你和你的团队组织今天的高级别讨论。我们欢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我们非常高兴与你以及在纽约的团队合作。

我还要感谢我们今天的通报人——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易卜拉欣·马亚基先生、希拉里·比克尔斯爵士和穆尼尔·阿克兰先生——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团队为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所做的工作。

可悲的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冲突在多年下降之后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的世界中。我们知道, 暴力会招致更多的暴力。暴力扭曲社会规范, 破坏机构, 摧毁国家和生活。脆弱国家特别容易遭受破坏稳定的暴力和武装冲突之害, 而付出代价的是普通公民。

我们知道, 冲突和暴力往往因环境因素而加剧。包括贵金属和宝石在内的矿产开采、木材开采以及野生动物捕猎往往是冲突的资金来源, 与之相关的环境退化和社会动荡则会破坏和平前景。

例如, 在委内瑞拉, 马杜罗非法政权是非法金矿开采的同谋并从中牟利, 这开采正在给该国南部的环境和土著人口造成灾难。武装犯罪团体, 包括一些被认定的来自哥伦比亚的恐怖分子, 正在掠夺该国的土地资源, 企图使冲突蔓延, 加剧委内瑞拉人民面临的困境。

由于外部恶意势力的干预, 脆弱国家也容易遭受破坏稳定的威胁。我们已经表示, 我们越来越关切的是, 一些国家利用其通过主权贷款和债务责任在脆弱国家获得的影响力, 推动不民主的治理做法。由此产生的腐败、对法治的不尊重和独裁主义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国家长期发生暴力冲突和不稳定的风险。

最大的罪犯之一是伊朗,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利用其邪恶的影响力在整个中东传播暴力。它通过自己直接的军事作用及其代理人“真主党”恐怖组织的作用, 支持凶残的阿萨德政权, 在制造难民危机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它因为向胡塞武装转让武器, 还在也门的人道主义悲剧和长期冲突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此外它也在伊拉克的动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因为它支持什叶派民兵。它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 向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伙伴、代理人 and 恐怖组织出口武器。伊朗正在加深、扩大和延长这些冲突。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挫败伊朗政权等居心不良的行为体的企图。伊朗政权在压制本国异议的同时, 也在其他国家制造不稳定。我们的制裁计划旨在限制像伊朗这样的不良行为体利用我们的金融系统或者威胁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平民的能力。尽管安理会一些成员作出不实指控, 但我们的制裁并不针对与人道主义有关的援助或活动。相反, 我们经常将这类活动排除在我们的制裁方案之外,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主动的。

美国政府还利用定向外国援助作为挫败冲突驱动因素的工具。今天, 美国对外援助的大约50%流向脆弱国家, 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中的70%。过去五年中, 美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定的15个最脆弱的国家投入了约300亿美元的外援。美国在世界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捐款中继续居于首

位，占联合国维持和平预算的25%——这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解决冲突根源的一个关键工具。

特朗普总统在签署2019年《全球脆弱性法案》时重申，美国致力于预防冲突和解决脆弱性。除其他外，这项重要的美国立法把地方自主解决、所有权和问责放在美国建设复原力做法的核心。

我们知道，性别较不平等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冲突。美国把妇女切实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作为优先事项，同时促进冲突和危机中妇女和女孩的安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2017年《美国妇女、和平与安全法》，美国政府随后于2019年6月发布了我们大胆创新的《美国妇女、和平与安全战略》，由此表明了我们在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和承诺。

美国继续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冲突的外交努力。就在几周前，特朗普总统主持了一个历史性签署仪式，在仪式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两国外交部长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宣言》，正式同意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这是自1994年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首项此类协定。10月23日，已宣布放弃恐怖主义的苏丹紧随其后，采取了历史性步骤，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开始经济和贸易关系。《亚伯拉罕协议》为进一步迈向区域和平奠定了基础。这些领导人果敢地为他们的人民选择了相互理解、共存和繁荣的未来——他们支持和平文化。

美国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处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明斯克小组的共同主席之一，正在与冲突各方合作，以求停止敌对行动，并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紧急恢复对话，以便通过谈判解决达成政治解决。

在叙利亚，第2254（2015）号决议所述政治进程仍然是解决十年前引发冲突的阿萨德残暴政权的唯一合法途径。美国仍然充分致力于执行第2254（2015）号决议，以确保叙利亚人民享有和平与繁荣未来。

美国致力于预防和缓解冲突，我们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外交和经济手段，解决导致脆弱国家易受破坏稳定的暴力和武装冲突影响的冲突驱动因素。我们希望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将与我们一道，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与和平。我们的工作，也是过去75年来我们联合国所有人的工作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让我们加倍努力，实现这一愿景。

附件20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亚沙尔·阿利耶夫的发言

首先,我谨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团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举行本次会议。

概念说明(S/2020/1064,附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以强化一种综合做法,推动问题的解决,并使这种做法成为主流。联合国成立75年来,在终止国际争端、解决冲突、铲除殖民主义以及让那些饱受战争、暴力与不稳定影响者重新抱有希望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

然而,冲突、旷日持久的外国占领以及缺乏问责继续危及和平与安全。种族主义观念和煽动族裔及宗教仇恨常常伴随对历史的不实描述,给冲突的爆发或持久带来破坏性影响。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危险使安全环境更具挑战,导致其恶化。

协调连贯的全球对策加上共同努力,是处理各种冲突、应对气候变化和冠状病毒病、打击恐怖主义、处理被迫流离失所和移民流动问题以及为所有人实现和平、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权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搭建了国际关系的基础性规范框架。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必须严格履行其国际义务,特别是涉及尊重彼此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际公认边界的义务。要有效解决问题,就必须执行联合国主要机关所做的决定。《联合国宪章》第25条明确阐述了会员国在这方面的义务。还必须努力处理冲突的所有根源,同时考虑到和平、安全、发展、人权以及法治彼此关联、相互加强。

阿塞拜疆对审议中问题的一贯立场众所周知,除其它因素外,我们的立场源于我国经受的武装侵略及其破坏性后果。安全理事会在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第874(1993)号以及第884(1993)号决议中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对阿塞拜疆采取了军事武力行径,这些行径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并且构成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然而,安全理事会对亚美尼亚占领军立即、彻底和无条件撤出所有阿塞拜疆被占领土的要求却没有得到落实。相反,亚美尼亚继续不受惩罚,一个直接结果是,该国当局形成一种放纵意识,放开手脚制造新的侵略行径和仇恨犯罪,导致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

只有消除亚美尼亚侵略的后果,从而确保其武装部队彻底撤出被占领土,恢复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实现境内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的返回权,和平、安全与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附件21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巴西感谢主席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角度，举行本次关于“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的高级别公开视频会议。我们还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和所有其他通报人富于见地的意见。

巴西借此机会重申，它支持建设和平。保持和平议程在许多方面与巴西外交政策中长期崇尚的价值观、特别是和平解决争端、和平与发展相互依存以及预防至上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为了继续改进联合国的建设和平努力，提高其能力，巴西愿提出三点简要意见。

首先，我们在和平工作方面的集体经验教导我们，可能导致某个社会走上和平道路或冲突道路的条件常常极为复杂。要分析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或潜在动因，始终需要全面的工作，旨在广泛了解任何具体局势下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因此，我们应摒弃把某个单一因素上升为不稳定主要动因的简单化论调，并且认识到：防止冲突或者建设和平没有单一的模板。

其次，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是跨领域的工作，只有在尊重主权和国家主导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意味着，我们希望通过建设和平来实现的许多结果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应该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其它政治论坛的领导下，根据其各自的任务授权，进行讨论和执行。

此外，我们应摒弃这样一种理解，即：暗示保持和平可被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要承认联合国不同支柱间的相互依存，我们就必须承认每个支柱的内在价值和特定的授权任务。促进发展、保护人权以及防止冲突均可推动建设和平，但是我们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努力也应根据其自身的实情进行评估。

最后，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把联合国各支柱的讨论衔接起来。要提高联合国建设和平努力的成效与协调连贯性，建和委就应继续提升其咨询能力，以期为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它认为必要的建议。

最后，巴西谨再次感谢有此机会参加本次讨论。我们欢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决定以一种透明和包容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向全体联合国会员国开放供其与会。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复制的良好做法，并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确保未来有关建设和平各种交叉问题的所有讨论充分包容各方。

附件22

佛得角常驻联合国代表何塞·路易斯·菲亚略·罗沙的发言

主席女士，我高兴地祝贺你和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主席。我看到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借选举后的势头统领这个知名的联合国机关，这有力证明了国家权利平等的最高原则。我谨向你表示祝贺并告诉你，你可以指望我国代表团给予支持，作为非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在这方面尽可能提供帮助。

主席女士，我还赞扬你选择辩论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这个话题作为你主席任期的标志性活动。我感谢你发出邀请，就该问题提交书面发言。这是一次及时的讨论，因为纵观全球我们看到，在遭遇如此众多危机的同时，世界现又遭到冠状病毒病的打击，这场大流行病及其整体影响使既有状况雪上加霜，给今后数年带来无穷的不确定性。

为了抗击疫情，人们可以说，而且也同意，我们需要迅速应对这一健康威胁，拯救生命，通过保护企业、受影响的民众和就业机会来实现经济和社会复苏，以及最后，重建得更好，并走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

受到《纪念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宣言》(大会第75/1号决议)精神的激励，我们呼吁重振多边主义，进行更好的合作，再次决心发扬团结精神，力求有所作为，支持提供更具包容性和针对性的援助，尤其是为最贫穷者和最弱势者提供这种援助。受到这一精神的驱动，我们还调集更多资源并加强协调。

应对冠状病毒病虽然是急需之举，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办法，要想做到高效和有效，还需要立足于自下而上的办法并得到这种办法的支持，因为自下而上的办法能够以富有条理的方式消除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预先存在，包围并最终可能损害适当应对疫情的机会和前进道路。

我们要从源头汲取灵感。创始者的遗产在于他们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并决定“设立国际组织，定名联合国”。联合国获得的授权是，采取适当措施“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促成国际合作”以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此外，联合国将“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这是把首要责任归于各国政府及其多边行动。

自联合国成立起75年来，世界没有爆发过全球性战争。然而，世界未能幸免无数的冲突，这些冲突源自未解决的国家或地区政治不满情绪和其他原因，例如非法经济收益和气候引发的资源短缺等。它们还可归因于若干加剧冲突的因素，从治理不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意识形态分歧、基于信仰和族裔群体的恐怖主义、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包括网络犯罪和不安全状况，到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仇恨言论，不胜枚举。

为本次辩论会的目的，我欢迎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最新报告(S/2020/773)。该报告立足于清楚描述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驱动因素，同时阐述“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全面跨支柱方法”和“联合国为促进...一致...支持各国政府和人民而开展的工作”(S/2020/773, 第10段)。

它准确地说明了秘书长所关心的保持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凸显了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以及与人道主义、发展和人权互动的重要性。

最后, 我自己的国家佛得角支持本次辩论会和任何其他有助于世界少一些冲突和多一些安全的倡议, 并投入于和平和更平静社会的驱动因素, 这是各国稳定和进步的根本条件。

附件23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暴力冲突蔓延、经济不安全状况加剧和气候变化影响增加，给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局势造成格外严重的影响。这些挑战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而加剧和倍增。

整个联合国采取一贯、协作、协调和高效的对策对于捍卫和加强发展成果、消除引发冲突的风险因素以及建设更加和平、强韧的社会至关重要。

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联合国建设和平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作为2020年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经历让我们获得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认识。

COVID-19疫情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联合国建设和平的成功故事往往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脆弱。即使在几十年国际建设和平支助之后，许多国家仍然只要受到一两次冲击就会陷入深度危机。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气候变化如何加剧冲突动因和增加脆弱性。

这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的办法，把为民众带来生计和经济安全以及实现包容性经济发展摆在建设和平工作的核心位置。这还意味着应加强我们共同评估和应对增加暴力冲突可能性的多种重叠风险的能力。

若无持续、可预测的资助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这些工作都无法进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已经是最落后者，而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使它们进一步倒退。它们需要可预测、可持续、协调的支助。

正因为如此，加拿大自愿支持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建和基金)，并于今天宣布打算共同主办明年1月建和基金充资会议。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尽其所能向建和基金捐款，并最大限度扩大其认捐的规模和时间跨度。

然而，预算外资金只是个“创口贴”，无法解决系统性问题。自愿资助可以在联合国系统中催化出短期成果，但我们还需要审视更长期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系统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工作应通过摊款来资助。这些活动对于履行联合国的任务授权和实现我们共同的建设和平目标至关重要。在我们商定出集体办法之前，加拿大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在反反复复、逐案处理的基础上取得进展。

我们还必须审视全球金融总架构，自问它是否符合创建初衷。特别是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向我们显示，对于多数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来说，该架构不符合创建初衷。

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在以下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是把稀缺的公共资源用于偿还债务和保持偿付能力，还是采取措施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任何国家，特别是刚摆脱冲突的国家，都不应被迫必须在无力还债与民众健康之间作出抉择。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些挑战，加拿大和牙买加同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一道牵头发出了“COVID-19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倡议”，并就如何克服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秘书长致力于确保各特派团有充足的方案资金来支持授权的建设和平活动，将此作为维和预算优先要求。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

采纳这些建议,特别是在特派团过渡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持续贯彻他们已经同意筹资和执行阶段的任务授权和优先事项。

最后,我们敦促安理会更好地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建和委是联合国唯一受权在各主要机关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以确保为各国努力建设和保持和平提供统筹兼顾、协调一致支持的机构。

随着更多的国家和区域利用建和委的召集权力,建和委也加强了这一桥梁作用,这使它能够更好地应对和平所面临的更广泛的挑战和风险——从大湖区的性别平等到太平洋岛屿的气候安全,不胜枚举。建和委能够成为至关重要的平台,支持联合国在国家层面作出改革努力,以加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共同分析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更频繁地征求委员会的意见,包括关于和平行动任务授权和特派团过渡的意见,特别是委员会关于长期建设和平挑战的意见。建设和平委员会就如何加强联合国解决冲突根源和维持和平努力的一致性提出正式建议,将会加强诸如本次会议这样的专题辩论。

附件24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我们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通过本次辩论提供机会，从安全理事会职能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能够把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的一些层面作为全球威胁来处理，同时强调必须保持系统其他部分，特别是发展和人道主义机构，包括卫生组织的努力的一致性，从而明确诸如大流行病这样的现象以及其他挑战如何可能影响或正在影响处于冲突中或建设和平进程中的社会。

我们认为，正如我们过去多次表明的那样，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应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在危机时期，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多边组织，其所有机构根据各自的授权和职能，妥善应对一切重大挑战。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让青年、妇女、民间社会和所有相关行为体参与进来是建立有复原力和凝聚力的社会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感谢今天这些高级别通报人所作的发言。

智利支持秘书长今年3月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这一呼吁仍然与现实密切相关，因为全球卫生危机继续构成风险，这是因为它对社会，特别是对最脆弱群体和受影响特别大的群体，如妇女和女童，造成毁灭性影响。

此外，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提供了重要工具，确保与和平进程相关的所有实体都采纳性别平等观点。此外，我们认为，在应对本次大流行病或其他危机对冲突或建设和平环境的影响，包括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相关的影响时，绝不能忽视这一方法。在应对影响和促进妇女在各级参与决策时，还应利用防范准备和应对能力建设及评价进程来加强性别平等观点。

考虑到目前导致冲突和不安全的多重因素，安全理事会不能脱离对这些因素的讨论，特别是当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全球危机和在实地造成毁灭性后果时。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冠状病毒病造成的多层面危机的经验教训，它揭示了机构和多边准备工作在一致应对新的全球挑战和威胁方面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秘书处开展反思活动，并且对建设和平架构进行以保持和平为导向的审查，以便评估例如当前疫情对安理会所审议的地理和专题局势的影响，确定需要采取行动应对的薄弱领域，并通过分享经验来确定适用于不同情况的成功实地进程，例如在和平行动中实施的速效项目，这些项目促进当地社区参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并且加强国家自主权原则。

开展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在整个多边系统内部建设在面对未来流行病和其他挑战和威胁时对于冲突和建设和平情况的准备性和应对能力。为此，我们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可靠、灵活和强大的信息渠道，重点是对紧张局势和发展进程受到的影响进行预警和评估。消除错误信息和打击散布仇恨言论对于促进和建设和平至关重要。

最后，我愿重申，和平环境是抗击大流行病和其他全球挑战以及消除今天的冲突和不安全因素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充满复杂挑战的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其自身行动范围内，为应对我们时代的巨大挑战以及加强全球预防、准备和应对能力的努力作贡献。

附件25

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哥伦比亚热烈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次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欢迎在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和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第三次审查的背景下组织本次辩论。

COVID-19大流行病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它还影响全球经济, 影响最脆弱的群体。因此, 团结、包容和人权必须是我们应对的核心。

哥伦比亚认为, 我们必须解决一切可能引发新一轮暴力的因素。近年来, 我们看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及其对世界上各个地区安全的影响。

我们欢迎在至关重要的一年举行本次辩论, 今年标志着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通过五周年, 目前, 我们各国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 确保从疫情中恢复的工作是可持续和包容性的。

这个十年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采取我们需要的紧急行动, 以果断和协调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来说至关重要。否则, 我们将无法实现我们在多边舞台上为我们自己设定的2030年目标。

科学清楚地证实, 根据《巴黎协定》由国家自主作出的贡献不足以到2030年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 而位于南半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国家将在经济增长方面受到气候变化后果的最大冲击。

哥伦比亚是一个有极其丰富多样性的国家, 拥有地球上50%的荒地, 这对产生淡水和维持高山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这些空间正受到气候变化可怕影响的威胁, 气候变化在世界各地产生虽然各不相同, 但却是全球性的影响。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拉丁美洲地区极易受到这一严酷现实的不利影响。

适应是降低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唯一途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发展中国家加强执行工作, 以期促进缓解和适应对策和解决方案。

我国借此机会重申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我们认为, 大会作为一个全球性机构, 提供了一种把气候变化与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考虑在内的全面和包容性方法, 是就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的适当场所。

最后, 我们要强调参与贩毒和非法采矿的非法武装团体对哥伦比亚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这些犯罪行为体包括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未整编成员、民族解放军恐怖团体和其他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有关联的团体。

今天, 国际合作和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对全面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附件26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佩德罗·路易斯·佩德罗索·奎斯塔斯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我们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表达古巴最热忱的问候和支持。我们深信,它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杰出代表,会为本机关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和实质性的支持。

今天,我们看到,《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断遭到违反,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平等、不公正和反民主的国际秩序——以自私取代团结、以少数人的利益取代千百万人正当愿望的国际秩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危险。美国在全球各地鼓吹冲突以及非常规战争和贸易战。它支持强行推翻主权政府。它鼓励恐怖主义,宣扬种族主义和至上主义观点,强加严厉的单边胁迫性措施,同时完全无视国际法。

美国凭借前所未有的实力,诋毁和攻击多边主义,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退出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对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进行财政讹诈。美国退出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例如与伊朗达成的各方同意的协议,以及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文书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同时它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破坏地球的平衡。

美国军费占全球军费38%——2020年超过1.917万亿美元。美国正在对网络空间进行军事化,并更新其核武库。在军备竞赛中,美国浪费对于我们各国人民的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同时拒绝合作应对COVID-19疫情造成的多重全球危机。

美国妄图重新推行门罗主义,破坏《宣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和平区宣言》,对不屈服于其意志的国家进行威胁和侵略。

美国对古巴采取新的步骤,加紧持续已久的灭绝种族性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即使在疫情时期也是如此。美国完全出于恶意,拼命诋毁我国提供的医疗合作,并威胁那些选择行使自己的主权请求我们给予帮助的政府。

要实现和平、正义和发展的世界,就必须消除冲突根源。正如古巴革命的历史性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战争的发生基本上只出于一个原因:一些人欲剥夺另一些人的财富。一旦掠夺的心态消失,战争的心态也会消失。”

我们重申秘书长的紧急呼吁,即:“结束战争的恶疾”,“在世界所有角落立即实行全球停火”,以及“放弃可能损害各国应对这场大流行病能力的制裁”。

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制止强加单边胁迫性制裁的做法,这些制裁已遭到联合国的反对。必须免除正在威胁南方各国人民生存的无法偿还的外债——这一债务现在因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而加重。

在这一复杂背景下,所有国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都有责任捍卫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包括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及其政治

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 以及和平解决冲突和避免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我们应寻求确保安全理事会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尊重《宪章》赋予本组织其他机关、尤其是大会的任务授权。

让我们努力促进和平、团结和发展。让我们建设一种民主、公平和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附件27

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丁·比尔·赫尔曼以北欧国家名义作的发言

我高兴地代表北欧国家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丹麦提交本发言。

今天的重要辩论会是在许多国家正在不懈努力应对这场大流行病新浪潮之时举行的。我们看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构成潜在的冲突驱动因素。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和粮食不安全状况、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等其他全球挑战也是如此。这些因素可能引发或加剧冲突、流离失所和非正常移徙，并逆转建设和平和成果。

今年还迎来联合国及其《宪章》七十五周年。今天，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与1945年相比有所不同，更为复杂。气候变化只是这些新威胁之一。安全理事会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为应对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复杂的跨国挑战，并减轻这些挑战对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潜在影响，必须对多边解决方案作出新的集体承诺。请允许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解决方案必须协调一致，统筹兼顾，贯穿于联合国人道主义、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工作，考虑到冲突和动荡的根源和动因往往密切相关。我们知道，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的努力如果与可持续发展、包括协调一致的气候行动齐头并进，并代表包括妇女和男子、女孩和男孩在内的全体民众，就会更有成效。自下而上，联合起来必须是默认的工作方式——从全面分析和政策框架到精简筹资模式，再到集体行动和成果，所有这些都须包括性别平等视角。

我们还知道，当所有人权都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时，社会便会更加强韧。推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执行工作必须成为优先事项。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整个和平进程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妇女、青年和被边缘化群体有权在决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我们大力支持联合国改革，并致力于贯彻落实《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大会第75/1号决议)。因此，我们需要保持势头，继续执行保持和平议程，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落实“以行动促维和”议程，并把预防冲突作为各领域的重点。

必须通过在权能得到加强的驻地协调员的领导下，在非特派团环境中联合开展预防和建设和平工作，以及通过特派团环境中和平行动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有效整合，将这些改革转化为实地的具体成果。必须根据良好的建设和平捐助关系，确保为保持和平提供可持续、一致和充足的资金。

北欧国家承诺向联合国COVID-19防治和恢复基金及建设和平基金等快速和灵活的基金提供非专用捐款。建设和平基金的工作是团结联合国系统的榜样，我们敦促新的捐助者支持其活动。增加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互动与合作有利于安全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是一个独特平台，汇集了各种行为体，能够使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与当地行为体就各种复杂和新出现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与协调。

第三即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能力和专门知识。为此，我们需要网络化和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以便整个联合国大家庭、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及私营部门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 安理会必须听取民间社会尤其是妇女组织的意见, 并与它们进一步接触。

最后, 虽然COVID-19疫情对多边合作及其机构提出了考验, 但它同时也证明, 维持强有力的多边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利益。秘书长呼吁在联合国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实现全球停火, 这证明我们有可能集体努力采取行动, 扭转冲突和不安全的趋势。我们北欧国家再次呼吁所有交战方——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响应这一呼吁, 终止敌对行动。根据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中作出的承诺, 我们必须激发重振多边主义、加强合作和全球团结的力量。我们继续应对世界各地出现的危机, 现在有机会重建得更好、更加环保, 实现对气候变化有抵御能力的可持续的和平未来, 全力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行动十年”。

附件28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安·埃斯皮诺萨·卡尼萨雷斯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首先,我谨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组织本次辩论会。我也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拉尔夫·冈萨维斯总理;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穆尼尔·阿克兰大使;非洲联盟开发署首席执行官干事易卜拉欣·马亚基;以及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希拉里·贝克尔斯爵士所作的发言。我会谈到本次辩论会的三个核心要素。

第一,安全理事会怎样才能最好地推动克服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带来的挑战?在这方面,必须重申,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决议,加入了全球抗疫努力,但花了四个月时间才做到这一点。秘书长和联合国会员国不得不发出若干呼吁,包括172个国家发表的联合公报——厄瓜多尔有幸成为其最初的支持者之一——安理会才最终制定出了一系列与减轻和抗击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相关的措施。但是,安全理事会如果集中全力促进并确保有效执行该决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延长该决议,以便所有局势中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的局面以及人道主义暂停能够无限期持续,直到这场全球卫生危机结束,就能弥补失去的时间。

事实证明,COVID-19疫情是不安全的媒介,不仅在冲突地区,乃至在全世界都导致实地情况恶化,这些情况是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恐怖团体等实施的暴力极端主义造成的。

第二,气候变化是当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它影响到所有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包括关于和平、正义和强有力机构的目标16。全球气温上升、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和干旱、海平面上升和自然灾害正在损害福祉、生计和生态系统。它们的不利影响导致粮食安全、失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局势,带来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要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落实手段——充足的财政资源、能力建设以及技术转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过度开发和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可能会扩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传播。由此我要说到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把预防作为建设和平的全面办法。

和平与安全不是孤立因素,而是努力消除特别是防止冲突根源的结果。这需要能力建设以及基于《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预警机制。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支持这种预防机制。它也必须促进和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及关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的第2250(2015)号决议。最后,它应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调,考虑武装冲突的经济层面,并促进旨在确保为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参与创造稳定环境的举措,以便能够重建和加固危机地区的社会结构并提高社会抵御能力。

附件29

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萨尔瓦多重申致力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将其作为联合国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要强调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和国际合作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萨尔瓦多认为,目前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造成的危机暴露了现有的不平等和脆弱性。除了对健康的影响,疫情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它给和平与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并有可能引发或加剧暴力和冲突,这可能会使近年来在和平方面取得的成就倒退。

在这方面,萨尔瓦多认为,当代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持续挑战,包括不平等现象和气候变化,清楚地表明,预防冲突的最佳途径是切实履行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承诺。

萨尔瓦多根据自己在和平进程中获得的经验和目前面临的挑战,确认采取协调一致的多层面办法应对目前挑战极为重要。在这方面,萨尔瓦多认为,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消除引起动荡和冲突的因素。一些国家和社会目前因COVID-19疫情而出现的紧张状况以及冲突可能增多的态势要求注重一点,就是需要建立更强有力的建设和平架构。为此,萨尔瓦多谨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联合国各主要机关之间的一致性和互补性被视为是建设和平所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应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的咨询作用,并确保它与联合国其他机构更密切地合作,同时遵守它们各自的任务规定。同样,我们认为,应当支持努力确保建和委工作方法更加灵活,并增加其审议的国家、区域和问题的数量。

第二,我们认为,必须加快和加紧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决议和关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决议——从萨尔瓦多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应保留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倡议和解决办法必须包容各方、以人为本,这意味着要系统性地让妇女和青年参与和平进程和决策进程。

第三,萨尔瓦多认为,确保建设和平进程拥有充足、可预测和持续的资源仍然是最大挑战。鉴于全球经济衰退,给系统应对疫情及其影响带来巨大压力,我们可能会看到建设和平举措被削弱。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会员国应加强承诺,维持并增加对建设和平举措的投入,以便为疫后重建作出贡献。

萨尔瓦多认为,要实现我所提到的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加强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进程与联合国系统重新定位进程之间的联系,目的是确保这些进程能够相辅相成,推动通过采取更加协调和统揽全局的建设和平办法取得进展,同时为兑现尚待履行的承诺指明一条明确而具体的道路。

最后,在本组织成立七十五周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开始之际,会员国展现政治意愿对于把承诺转化为具体和切实成果至关重要,有助于落实我们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作出的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该议程是本组织预防冲突的最重要工具。

附件30

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过去二十年来,暴力冲突总体上有所减少,但不安宁局面仍然存在。今天,因族裔和宗教紧张状况而加剧的分裂倾向、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分裂、“我联合国人民”被边缘化、发展不足、资源匮乏、国际动荡、气候变化以及现在还有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是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状况最受公认的驱动因素。

但是,全球治理不公正和缺乏政治意愿也会助长不安宁状况和冲突。有些国家被剥夺平等发言权,面对违反法治而不受惩罚以及不遵守或执行国际商定协议的情况,被迫另寻办法。想当初,由于联合国受到列强威逼,未能履行职责,厄立特里亚人民被迫进行30年浴血武装奋战方获独立。

当联合国、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和美国拒绝承担它们作为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阿尔及尔协议》的见证者和担保者所负的道德和法律义务,或是拒不执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划界决定时,厄立特里亚人被迫保卫自己的国家,因而延长了国民兵役期限。今天,尽管国际社会保持沉默和推卸责任,但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仍保持着热情友好的关系,因为埃塞俄比亚现任领导人断定现在应当遵守条约义务和法治。

安全理事会从2009年到2018年对厄立特里亚国实施的长达九年的不公正制裁,也导致阻碍本区域发展与和平的冲突和不安宁状态旷日持久。全球反恐战争处理不当,造成非洲之角地区和平与安全恶化;人们无谓地失去了生命,也失去了机会。非法武器流动和全球普遍军事化也造成了后果。绝望者和贫穷者受到诱惑加入跨国犯罪网络,这些网络给世界各地的社会造成了浩劫。

目前的大流行病迫使我们所有人关注我们的薄弱环节和结构性漏洞。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仍然是唯一能够应对各国和各区域内部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办法。我们这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一个富有活力、反应灵敏、不会让任何声音被忽视的多边体系。

我们在进入“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之际,大家必须一起工作,加倍努力减轻COVID-19疫情造成的挫折,以充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所阐述的我们各国人民的愿望。在北京会议25年后的今天,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在多数灾难中,妇女仍然遭受重创;就COVID-19疫情而言,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

安全理事会决不可被用来助长大国和强国,欺压小国和弱国;它应是为所有人发声的道义力量,努力维护和促进和平。

附件31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当代暴力冲突形态与催生联合国并为联合国开展工作提供启发的战争有着根本的不同。冲突的驱动因素在不断变化。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暴力,我们必须继续修正我们的认识,调整我们的做法。因此,欧洲联盟(欧盟)全力支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倡议就“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驱动因素”举行本次适逢其时的辩论会。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及其潜在影响可悲地提醒我们,什么是对集体安全的威胁。这场大流行病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不带偏见地冷静看待处理这些影响的新的集体方法。

安全理事会曾处理过对脆弱社区的安全具有巨大潜在影响的健康危机——例如2000年的艾滋病/艾滋病疫情或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宣布病毒传播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我们今天所处的大流行病状况并不新鲜。然而,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理解。

当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3月23日首次呼吁全球停火以应对COVID-19时,许多国家的作战人员表示支持。但没有一方贯彻落实并停止战斗。我们现在知道,这场大流行病的安全影响不会来自自愿停火。相反,它将来自疫情对经济、卫生架构和社会保障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虽然迄今为止全球政治暴力和冲突的水平大致保持稳定,但这场疫情的经济影响可能导致尤其会伤害贫困国家的全球衰退或萧条,其干扰性可能被证明超出这场大流行病最初的健康影响。

此外,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加剧了脆弱性,放大了弱点。再加上原先就存在的危机,这让本就脆弱的系统所处的情况更加复杂;安全理事会早就认识到这一事实。2017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349(2017)号决议,其中涉及需要应对气候相关风险,以解决乍得湖流域的冲突。

对和平与安全的挑战,无论是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健康还是环境方面的挑战,都是相互关联的。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超越75年前建立联合国架构时依据的对冲突的理解,从而使我们的应对工作实现联合国各机构和支柱之间的协调和整合。

安全理事会旨在保障集体和平与安全,但为了完成任务并处理当今冲突和不稳定的核心驱动因素,它必须与广泛的行为体接触,并理解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是一项持续的工作,已经试验了多种模式,包括前景展望会议、对所有联合国机构的实地考察和与其召开会议、以及发展机构负责人的情况通报。这些方法应得到加强和进一步探索。

对人道主义援助和COVID大流行病后救济的需求正在增加,但在危机和灾害期间,绝不能忽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注。还应该听取秘书长关于将20%发展援助用于受冲突影响的建设和平工作的呼吁。

此外,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专门知识中心。秘书处的气候安全机制汇集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专门知识,涵盖与环境、发展、冲突与和平问题有关的支柱,是跨部门分析的绝佳来源。这一分析应被纳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安全

影响的报告。我们可能需要更多这类中心来组织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并实现有效的预警、预防和反应。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一体化卫生”办法，它汇集了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领域的专家。

建设和平委员会是一系列广泛行为体进行讨论的一个有益的平台，这些讨论可为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提供信息。最近，该委员会讨论了COVID-19大流行病在乍得湖流域和布基纳法索等地区的影响，并就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综合稳定团接下来的授权任务提供了咨询意见。这表明它有能力将实地知识转化为对安理会决策的贡献。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欧盟继续与联合国系统所有部门以及区域和地方伙伴密切合作，深入参与消除不稳定和冲突根源的工作。在气候变化和新疫情造成或加剧冲突，有可能抹杀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导致各国及其人民重新陷入贫困的情况下，欧盟仍是和平与发展的坚实、可靠伙伴。

附件32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我谨衷心感谢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组织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联合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全球危机。冠状病毒病已经夺去100多万人的生命,重创了社会,使全球经济深陷衰退。此外,这场大流行病加剧了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限制了现有的建设和平行行动,给原本就脆弱的安全、政治、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环境施加了额外压力,给联合国所有三大支柱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与此同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危机继续加剧原本就脆弱的局势,包括加紧对土地和水等稀缺资源的竞争,剥夺人们的生计,并导致被迫流离失所。

预防迫在眉睫的灾难必须成为我们全球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努力的核心。虽然各国政府对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负有首要责任,但联合国系统可以为建设更和平和更有复原力的社会开展更多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肯定建设和平委员会发挥的特殊作用,它为建设和平努力提供支持,并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发挥了桥梁职能。只有通过联合国系统所有三大支柱的协调行动,才能成功预防和应对各种相互重叠和关联的威胁。因此,在负责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的主要机构之间建立有效关系,必须成为当今联合国系统的首要任务。

忽视当前危机引发的危险无疑会造成更严重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受冲突影响和冲突后国家,那里本已脆弱的安全、人道和社会局势很容易爆发危机。格鲁吉亚是亲身经历过新兴全球威胁严重后果的国家之一。在这场大流行病的背景下,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系统性攻击的目标。事实上,在大流行病期间,俄罗斯联邦公然违反其国际义务和承诺,无视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加大了对格鲁吉亚的挑衅规模。

俄罗斯联邦不仅开展军事演习和军事集结,不断加固占领线,采取任意拘留、绑架的非法做法,侵犯受冲突影响者的基本人权,以及拒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格鲁吉亚被占领的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它还加大了对格鲁吉亚使用混合战争工具的力度,并一直在编造以宣传为目标的流言,攻击我国国家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中心——理查德·卢加尔中心——的一个实验室,该机构在格鲁吉亚抗击冠状病毒传播的工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尽管面对这种残酷现实,但格鲁吉亚仍然致力于尽最大努力,关照一直承受俄罗斯非法占领的沉重负担及其在大流行病期间严重后果的受冲突影响的人们,并确保对他们的人道主义救济。

发言最后,我谨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俄罗斯联邦首先根据欧洲联盟调解达成的2008年8月12日停火协议,立即开始履行其国际义务。此外,格鲁吉亚随时准备为旨在加强执行联合国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议程的全球努力做出贡献。

附件33

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危地马拉谨感谢安全理事会2020年11月份主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召开今天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当代冲突与不安全的驱动因素”的高级别公开视频会议。我们也要感谢所有通报人的通报。

危地马拉长期支持旨在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努力, 呼吁在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支柱间采取更全面的办法, 以便加强联合国系统工作的协调和一致性, 更好地完成本组织的任务。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清楚地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孤立国家的简单集合; 相反,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确保各国人民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在这方面, 显然需要联合国系统采取全面对策, 努力实现可持续的恢复, 这种恢复必须为建设更和平、更强韧的社会铺平道路。

危地马拉从自身经历中得知, 必须加强机构和治理能力并执行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以便我们能为实现国际社会商定的目标和巩固持久和平作出贡献。但我们仍需填补空白, 以制止现有的冲突驱动因素破坏社会和经济复原力。预防性外交必须成为我们努力的核心。在应对危机时, 投资于预防和建设和平努力可以带来切实利益, 有助于避免冲突的破坏性和长期影响。在这方面, 安全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极端天气事件、疾病的传播、人道主义危机、流离失所、贫困加剧、干旱和饥饿等当代风险因素只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可能带来的阻碍各国社会持久和平的严重后果的一些例子。灾害还有可能加剧现有冲突, 改变冲突的形式和持续时间, 甚至导致爆发新的冲突、进一步煽动分裂。例如, 在这次COVID-19疫情期间, 危地马拉及其所在区域受到了热带风暴的影响, 证明了这些天气事件会如何破坏已取得的成就, 进一步增加对生计、国家预算和治理的现有压力。

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我们在讨论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时, 谈论的是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 这两种威胁会相互加剧。因此, 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需要安理会所有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彻底审议。

我们强调,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探索如何加强预防、早期发现系统和业务行动, 以避免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资源管理不善造成的冲突, 同时要考虑到社区紧张关系和治理。

附件34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T.S.蒂鲁穆尔蒂的发言

虽然自1946年以来,全球战争造成的绝对死亡人数一直在下降,但冲突和暴力事件仍在增加,今天许多冲突变得分散得多,在政治民兵、犯罪实体和国际恐怖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尽管各地区差异很大,但有组织犯罪和帮派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武装冲突。

技术进步也在推动改变冲突的性质。有人担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能会加剧网络、物理和生物攻击,例如使它们目标更精确、更难归责、更容易由小群体——甚至可能是“孤狼”——实施。今天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激进团体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公众,从而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效地进行招募、煽动和宣传,并且更容易购买武器和进行非法转账。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支持的深度学习来进行“深度造假”,这有可能助长虚假信息、分裂和政治不稳定。

新兴技术也在降低获取生物武器——用于伤害或杀死人类、牲畜和作物的有毒物质或疾病——的障碍。有人担心,人工智能和三维打印的进步可能会为攻击打开方便之门,使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开发部署自动化,从而在没有道德指针的情况下将生死责任从人类道德系统转移到复杂的数据系统。

除上述内容外,法治崩溃、国家机构缺失、非法经济收益和资源匮乏也已成为冲突的驱动因素。此外,近年来,冲突变得更加持久、久拖不决,传统解决方式见效也更为缓慢。最后,恐怖势力继续无休止地煽动恐怖和不安全。

75年前成立联合国是希望在世界勉力摆脱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时,有一个机构能够管理国家间关系,但今天新的、更加复杂难解的冲突驱动因素要求采取全面、创新和包容性的多利益攸关方对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将建设和平视为对暴力冲突的强有力的威慑。印度认识到,各国政府和当局在确定和推动旨在冲突各个阶段保持和平的优先事项、战略和活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并强调包容性是推动实现国家建设和平目标的关键。

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历史上最大的部队派遣国之一,印度对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也为为这一成功作出了贡献而感到自豪。然而,仅靠维持和平不足以保持和平与安全。维持和平得到建设和平的有力帮助和补充,将有助于迈向可持续和平和发展。

建设和平活动迄今仍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绊脚石。要使建设和平努力更加有效,迫切需要可预测和可持续的供资。

在分裂的社会中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建立对政府的信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确保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不重新陷入混乱,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治理结构,增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保证提供基本服务,并增加公民参与治理的渠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相信,有效和强有力的治理结构将有助于稳定和平、保障基本权利、保护法治,并使治理具有代表性和透明度、顺应民意、以人为本。

印度在阿富汗冲突后重建工作中以人为本的建设和平领域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即使一再面对恐怖袭击,印度仍然坚持实施并投资于价值30多亿美元、覆盖阿富汗所有省份的有影响力的基层发展伙伴关系项目。例如,在教

育、培训和能力建设领域,印度协助阿富汗政府在坎大哈建立了阿富汗国家农业科技大学。这是阿富汗的首个此类大学。

印度建设和平努力的根本方法是尊重国家自主权,并以会员国的发展优先事项为指导。例如,去年,来自冈比亚主要政府部委的25名高级公务员,包括副检察长兼法律秘书、常务秘书和副常务秘书,在印度国家善政中心接受了培训,了解实地管理和善政方面的最佳做法。该方案是在我们的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旗舰方案下开展的,该方案每年通过能力建设领域的奖学金援助160多个国家。

今后,印度将继续不仅在所在地区,也在非洲、太平洋、加勒比群岛和其他地区大力推动建设和平,把以人为本的方法作为重点。

在我们纪念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世界上有20亿人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在这些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妇女正在克服巨大困难,努力建设和保持和平。确保采纳性别平等视角和妇女参与建设和平至关重要,包括在预防、解除武装、流离失所环境中的保护、维持和平、决策以及重建等方面。

安理会会记得,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支全女性建制警察部队来自印度,她们驻扎在利比里亚。这支建制警察部队的所有女性成员由于她们的奉献精神、专业性和积极主动性,已经证明是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榜样,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表明妇女能够为提供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今天,印度的妇女接触小组成员也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在考虑让青年成为建设和平的积极力量时,必须考虑青年常常面临的挑战,因为冲突局势导致他们失去受教育机会、缺乏就业技能,稳定的家庭环境遭到破坏。在冲突后环境中,年轻人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需求往往被忽视,因为他们没有被视为弱势群体。青年精力充沛、能力强,并且能够适应新技术趋势,必须向他们提供培训机会,特别是在数字领域,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建设和平。

我们相信,以人为本、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和技术领先的解决办法和民主治理机构可以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方面拥有发言权,是建设和平取得成功和保持和平的最大保障。

附件3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的发言

首先,我要强调这一原则性推断,即只有冲突的所有根源和驱动因素得到公正、适当和全面解决,特别是通过加强国家对相关和平和政治进程当家作主,让各方尽可能广泛地参与,以及扩大区域和国际调解和支持,才能全面和永久解决冲突。

这必须成为处理冲突的指导原则,因此,必须根据冲突局势所有驱动因素在冲突的出现或升级中发挥的作用来考虑这些因素,无论它们是新的还是旧的因素。在这方面,必须对解决当代冲突的驱动因素,如气候变化或流行病的影响予以适当关注,因为有可信证据表明它们是加剧冲突的风险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当代冲突驱动因素的独特性质需要采取新办法和创新措施,以适当和现实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似乎无法通过实施制裁等传统措施来恰当处理气候变化在冲突出现或升级方面的影响。相反,通过向有关社会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影响。这些正是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改善局势方面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域。

在加剧和延长冲突的新因素中,我们可以提到实施单方面强制性经济措施。此类做法近年来被广泛采用,某些情况下由于阻碍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阻碍重建努力、破坏和平与和解进程,冲突迟迟得不到解决,从而导致受影响人民承受更多苦难,在令冲突恶化和旷日持久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幸的是,单方面胁迫性经济措施的影响与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等其他新的因素相结合,变得更具破坏性和更加可怕。它们使受冲突蹂躏的有关社会的经济状况恶化,使需要帮助的民众无法获得人道主义物资,特别是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结果显而易见:不幸的是,那些最脆弱的人承受的痛苦最深。

我们还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在某些甚至不需要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实施制裁产生的影响。其结果是,此类措施不仅严重侵犯了有关国家的主权权利,还导致其安全和稳定遭受不利影响。

尽管冲突的新的驱动因素需要安理会适当关注,但这绝不能以忽视或低估冲突的传统驱动因素为代价,如侵略行为、外国占领、外部干涉等,这些因素继续在世界许多地区冲突的出现、升级和延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只有在除采取现实办法解决冲突之外,还确保对冲突各方一视同仁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解决冲突努力才能有效。

附件36

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庆祝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反思我们学到的经验教训。冠状病毒病和气候变化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全球危机以多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各个国家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来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巨大而复杂的，其驱动因素是不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还有病毒和全球化破坏性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全面地应对这些挑战，充分考虑我们当代世界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实。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应对21世纪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时，绝不能简单地运用20世纪的条条框框。采取这种做法无视大局，导致应对措施不完全和结果欠佳。

根据《宪章》第七章，安全理事会拥有明确职权，决定如何处置和平面临的威胁。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就什么构成威胁达成共识，这可能损害安理会采取切实行动的能力。

冲突的恶性循环既是贫穷、粮食无保障、不平等和流离失所等现象的驱动因素，也是其结果。我们这个时代几个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发生地——即也门、萨赫勒和叙利亚——也是一些最旷日持久的冲突所在地，这并非巧合。根据第三十九条作出的反应必须考虑到这些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

解决这些驱动因素，支持两性平等，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在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建设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可以预防冲突，包括——主席先生——在加勒比岛屿社区，如贵国所在的社区。充分顾及这些问题，采用全面办法预防和解决冲突，安理会就能更有效地促进建设可持续和平。

我们并不是建议安全理事会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专注于可持续发展或气候变化的机构。联合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机构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授权在不同方面适当发挥领导作用，但与任何复杂的系统一样，其效力取决于各要件运作的协同程度。安理会开会审议具体局势或专题关切时，不能脱离实际。

联合国工作的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人权及发展——往往被描绘成毫无交集的平行轨道，而不是共同承载世界愿望的三个支柱。令人庆幸的是，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子表明，我们已集体驳倒此种错误的描述。

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弥合联合国各机关和实体与其他国际和区域行为体之间的差距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值得赞扬。2016年，安全理事会第2282(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这两项相互依存的决议一致主张，“在冲突的各个阶段及其所有层面”保持和平，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尽管这一共识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爱尔兰和肯尼亚的引导下，各国于2015年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划了一条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使世界旧貌换新颜的复杂道路，这一规划不是基于对进步的狭隘理解，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以及对我国各国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

安全理事会——广而言之，联合国系统——采取以人为本的应对行动，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努力增强社会凝聚力，消除不平等现象，这有助于建设和保持和平。这些努力能够而且应该有助于应对我们面临的各种当代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攸关健康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冲突，还是人道主义需求以及——至关重要——这些挑战之间的关联。

在我们寻求支持联合国建设和保持和平的集体努力时，作为候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爱尔兰不会忽视这一认识。

附件37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意大利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为讨论攸关联合国未来的议题提供机会。

赋予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议程以实质内容意味着以深思熟虑的方式看待联合国的未来。联合国的能力无与伦比，必须通过加强其在总部和实地的所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和协调来充分加以利用。意大利认为，增加对最脆弱国家的支助依然是一个绝对优先事项。我们还将在意大利即将于2021年担任20国集团主席的背景下推动这一优先事项。

必须将冠状病毒病(COVID-19)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转化为在各层面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以及为当前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进程提供依据的机会。意大利将继续致力于为审查进程做出贡献。我们必须防止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等领域来之不易的成果被逆转。

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尤其应该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各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组织之间的现有伙伴关系，为应对各种相互关联的复杂挑战制定协调一致的全面对策。

必须让当地社区和私营部门参与这一努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全球做出真正协调一致的努力，才能有效处理当前危机的后果。COVID-19大流行告诉我们，有必要在不同领域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对策，促进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议程。

全球保健始终是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先决条件，与和平、人道主义和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相互作用。正因如此，全球紧急情况一爆发，意大利就大力支持国际社会团结互助，积极倡导建立国际联盟，推进预防COVID-9疫苗的研究工作。

作为20国集团候任主席国，我国将在与联合王国合作主办第26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框架内，努力确保气候行动成为大流行病后恢复的基础。我们坚信，气候变化是又一个与和平、人道主义和发展之间的联系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气候变化并没有因为COVID-19大流行而暂停。

明年将有机会通过更多的重大活动，包括意大利将与欧洲联盟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粮食系统峰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峰会，加强气候行动的国际势头。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特别注意气候变化、粮食系统和公众健康之间的密切关联。

大流行病必须进一步促使我们研究制定一种以协调、合作和灵活利用现有平台为基础的全系统对策。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动调整其工作方案，以应对当前局势的挑战。资金更充足的建设和平基金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支持国际社会采取对冲突敏感的疫情防控措施；支持当地社区的努力；以及促进从建设和平角度采取的协调一致的COVID-19防控措施。

意大利随时准备在若干优先领域做出贡献。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能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本着这一精神，意大利致力于支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所有相关行为体努力防止全球粮食危机，并一

直通过粮农组织倡导建立粮食联盟,以调动专门知识,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对话空间,推动致力于创建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的举措。

大流行病提醒我们,必须全面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妇女和女孩尤其容易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容易不平等地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加倍致力于实现性别均等,确保妇女切实参与决策进程。

附件38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石兼公博的发言

我谨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阁下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表示衷心感谢。安全理事会在由贵国和新西兰常驻代表共同协调的2020年建设和平架构审查政府间进程期间讨论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多方面挑战,此举非常适时。

我想谈谈日本对你的概念说明(S/2020/1064,附件)中提出的问题的看法,即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气候危机中汲取的教训,联合国各机构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以及在人道主义-发展-和平之间的关系中采取综合办法来应对当代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日本从人类安全的角度看待COVID-19、气候变化和其他顽固存在的发展挑战。与武装冲突相比,它们是另一种性质的威胁,但由于它们给人民的生存、生计和尊严带来负担,因而对区域稳定并最终对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COVID-19大流行对许多国家的国家卫生系统的复原力提出了考验,其社会经济影响将不可避免地打击最脆弱的群体。得到有效、可问责和包容各方的机构支持的国家自主措施不仅是抗击病毒的关键,也是赢得人民对政府信任的关键,而信任是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先决条件。

这是第一个经验教训,也是日本在今年整个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进程中强调机构建设重要性的原因。我们呼吁其它国家利用五年一次的机会,通过促进重点讨论机构建设的支助问题来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

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正在损害人的安全,在社区缺乏复原力的地方,它们成为冲突风险的倍增器。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和面向预防,目的是保护所有人民和社区并增强其权能。我们的行动必须是全面的,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并充分考虑到人道主义-发展-和平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从当代另一个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中汲取的第二个教训。

我们如何才能加强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使其促进全系统的合作,以便能够提出整个联合国系统的综合行动?在日本看来,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以大有作为,也可以改进自己。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主要宗旨是,调动所有相关行为体协力筹集资源,……提供咨询意见,并提出综合战略”(大会第60/1号决议,第98段)。

这是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话,他们在2005年决定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

建和委应深化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实质性讨论,例如机构建设,并成为交流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与愿意讨论其优先事项的国家接触、提高认识、调动技术和财政支助以及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外伙伴关系的主要平台。

日本作为2020年建和委副主席,期待着建设和平架构的审查进程取得丰硕成果。

附件39

肯尼亚常驻联合国副公使迈克尔·基博因诺的发言

我赞扬安全理事会11月主席国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我们注意到，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越来越多地具有政治、社会经济、卫生和环境性质，因此我们相信，本次辩论会将成为一个交换意见的平台，就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对安全的影响，以及安全理事会在促进采取综合一致的全系统对策方面的作用进行讨论。

《联合国宪章》设想了一项预防性外交战略，要求安全理事会分别根据第四章第十一条和第十章第六十五条，与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调工作，以便能够“造成国际间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

因此，安理会要想有效履行其任务，就必须审议冲突的相关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先前所作的各项通报进一步提醒我们，建设和维持和平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它们强调，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各国政府、次区域和区域组织、地方和平建设者、民间社会和学术界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确保和平、安全、发展、人权、法治和司法的可持续性。

本着非洲自主和主导的建设和平努力的精神，我国代表团特别欢迎安理会与非洲联盟发展署接触，该署继续根据《2063年议程》确定发展和建设和平的优先事项并协调区域项目。

关于发展、建设和平和保续和平，欠发达与不安全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赞赏秘书长不断发出三重呼吁，要求为进行改革而加强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发展系统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

事实上，联合国系统的三大创始支柱——和平与安全、人权以及发展——承认这些要素是相辅相成的，并设想了一项行动战略，据此将采取全面的办法解决冲突的根源，包括消除贫困和建立具有复原力和包容性的治理机构，为实地人民带来切实的成果，同时不遗漏任何人。

2020年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十年”的开始。在肯尼亚，我们继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各个部门，除其他外，制定我国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以及和平行动培训课程。

关于大流行病、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埃博拉危机等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对社会凝聚力、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导致建设和平进程取得的成果出现逆转，特别是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

虽然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影响了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但对当地建设和平人员和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工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本已脆弱和经历冲突的地区，以及在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

秘书长呼吁实现全球停火和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是重要的一步，有利于认识到冲突局势中的暴力和不稳定状况会加剧该大流行病，而该大流行病又会反过来加剧冲突局势的有害人道主义影响。

我们在肯尼亚看到了通过集中资源和与多级利益攸关方合作应对这些挑战，共同应对该大流行病影响的价值。我们的COVID-19国家工作队由一个跨越卫生、法律、安全和安保领域的专家团队组成，当然还有经济学家和通信专家的参加。

关于气候变化、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研究表明,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大多数区域, 包括萨赫勒和非洲之角, 也是众多多边和平行动特派团的所在地。在非洲之角, 牧民社区越来越容易受到气候多变性的影响——事实证明, 在牧场不断减少和水源减少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既是冲突的根源, 也是冲突的加剧因素。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 因为它涉及国家和领土的生存。安理会需要通过借鉴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在内的主要国际和区域文书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相关咨询意见和具体数据, 表明它致力于解决气候对安全的影响。

在气候行动方面, 肯尼亚政府建立了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框架, 包括《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把气候行动纳入我们发展规划进程的主流。

附件40

列支敦士登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的发言

列支敦士登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让安全理事会继续公开讨论当代冲突驱动因素。在安理会工作中故意忽视人的安全，会限制安理会切实履行其任务授权的能力，即使从最严格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并使安理会成为日益普遍的人的安全危机中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一些成员让安理会仅局限于处理战争和武装冲突等所谓“硬性”安全问题，这种尝试反映的是一种过时的和平与安全范式，目光短浅，紧盯着军事化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2007年，安理会首次审议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见S/PV.5663）。然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缔结以来的五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而且未来五年世界气温上升1.5°C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一阈值在巴黎谈判期间被视为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列支敦士登感到高兴的是，安理会越来越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次要影响，例如非自愿迁徙、贫困、失去生计以及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很有价值。

列支敦士登还继续支持努力利用联合国发展系统各部分，例如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安全机制的专门知识。系统性地提及气候变化对安理会所处理局势、特别是非洲大陆以外局势的影响是必要的，而且早该这样做。但是，安理会还必须处理这些影响的根源。安理会少数成员国加在一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以上，这些国家必须紧急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冠状病毒病(COVID-19)导致人权受到了广泛限制，并增加了大量民众陷于贫困和饥饿、教育受到巨大负面影响、不平等程度上升、社会紧张状况加剧的风险，因此也给人的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我们重建得更好的蓝图，也是在国际法、人权、合作、团结和多边主义基础上保持和平的路线图。列支敦士登感到高兴的是，安理会处理了COVID-19疫情问题，尽管是以有限的方式这样做的。我们鼓励安理会在这一先例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采取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办法。这可以包括安理会为全系统就这场大流行病给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的讨论作出贡献。这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贫穷和饥饿、卫生、教育、性别平等、言论自由以及信息和隐私等方面。

这场大流行病加剧了秘书长确定的、我们各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威胁——削弱了民众对我们机构的信任。即使在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社会，法治也会受到挑战，民主进程也会遭到攻击，而要处理这些问题，必须要有负责任的领导层、长期的政策思考、更强有力的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承诺，并就信息及社交媒体的作用进行坦率的讨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6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确保安理会履行其任务授权至关重要。

附件41

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马耳他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讨论“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驱动因素”问题。我们还感谢今天的各位通报者分享他们宝贵的见解和经验。

概念说明(见S/2020/1064,附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岛。作为一个岛国,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点。冠状病毒病疫情是未预见到和未预计到的危机,它进一步突出显示,某些挑战不分国界。这种情况要求的是更多的合作和集体应对,而不是孤立主义。

不幸的是,这场大流行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未来数年可能会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必须注重确保在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取得的成果不会遭受重大挫折。需要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发展与安全的联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明天取得的成果。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响应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

多边体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是,多边体系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继续投入于这一体系。就在几周前,我们通过了《纪念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宣言》(大会第75/1号决议)。《宣言》概述了我们取得的成就,但也告诫我们不要自满。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采取行动。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两次毁灭性的全球冲突结束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其宗旨是实现和平与安全。若无政治意愿,多边机构便无法生存。我们理应加倍努力加强这一体系。国际社会需要有一切适当的工具来确保自己继续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一点也适用于安全理事会。作为受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安理会必须迅速和足够灵活,能够查明和应对新挑战。

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和促进建设和平良好做法。今年的审查将为继续发扬已经取得的成就提供机会。此外,今年还迎来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我们再次借此机会强调妇女和青年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建设和平所有阶段工作的重要性。10月30日,马耳他启动了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

如果我们不紧急全面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就会给我们所有人造成毁灭性影响。时不我待。不可搁置这个紧迫问题,因为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只会继续加剧已经令人担忧的局势。短短几十年,我们所在的地球就从一个充满生机的健康、绿色的世界,变成一个不那么充满活力、正以惊人速度失去其自然美和生物多样性的地方。在气候变化领域无所作为将对和平与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因为这会造成争夺日益有限的资源、失去农田、卫生系统瘫痪以及大量民众因海平面上升和缺乏机会而流离失所等问题。

我们有责任及时查明这些新的和不断演变的挑战并就此采取行动。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科学知识正以指数速度增长,信息传递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加强合作,改善知识共享。通过这样做,我们将具备更好的条件来预测和预防新挑战——或者至少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新挑战。为了我们的民众和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做到这一切。

附件42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墨西哥欢迎今天的辩论会,这次会议特别及时,恰逢就两项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决议(大会第70/262号决议和第2282(2016)号决议)召开讨论会,期间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将核可五年期审查。鉴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审查进程的协调人,我们欣见今天的辩论会与大会进程相契合。

国际安全是多层面的。各国面临的威胁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挑战以及大流行病和环境挑战等其他现象有关。因此,这些威胁不能孤立地解决,也不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克服。虽然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如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也可以在防止发展挑战变成和平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疫情表明,必须在国际法、合作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全球治理。安全理事会负有寻找全球解决办法的特殊责任。如果安全理事会反应迟缓或陷入瘫痪,外加不在实地采取任何行动,人们因此所产生的看法就会影响到整个组织和整个多边主义。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必须承担起责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对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以及建设和巩固和平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本组织目前正在评估疫情将会如何加剧本已严峻的局势,例如暴力、对性别平等的挑战、贫困、政府机构薄弱以及可能构成结构性冲突成因或导致冲突复发的其他缺陷。

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其为冲突地区提出的解决办法及其对预防性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以及特别政治任务的定义中包括:根据大会第70/262号决议和第2282(2016)号决议,促进并支持制定和实施遵循保持和平这一共同主线的预防和解决冲突的一致办法,并推动实现国家目标和优先事项。

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发挥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并在建设和平架构,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发展系统之间建立明确有效的沟通渠道。

附件43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奥马尔·海拉尔的发言

[原件:法文]

首先,我谨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主席。我感谢主席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感谢其选择的讨论议题。

我也要感谢通报人所作的全面发言。

摩洛哥欢迎今天辩论会的主题,该主题使我们能够超越寻常讨论,在建设和平方案中纳入很遗憾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因素,例如气候变化和健康风险、粮食不安全以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影响。今天的辩论会还使我们能够重申建设和平的一些重要原则,包括必须共同努力的原则,同时展现协调和一致性。

作为建设和平原则的热情支持者,摩洛哥遵守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的指示,致力于向友好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并在我国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南南合作。

摩洛哥认为,如果没有整体愿景,建设和平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首先,预防必须成为优先事项。本着这一精神,摩洛哥通过其区域办事处的调解努力和斡旋任务,向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提供政治和资金支持,协助其开展预防活动。

第二,摩洛哥迅速采纳了和平、安全与发展相互关联的概念,同时在其合作努力中促进整体愿景。摩洛哥很自豪能够为若干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支持,提供农业、电气化和水资源管理等领域的专家,满足有关国家最紧迫的需求。

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中非共和国小组主席,摩洛哥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将工作重点放在支持政治进程、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恢复计划《2017-2021年国家恢复和建设和平计划》以及法治上。

摩洛哥也是改善建设和平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合作的先行者。该小组刚刚连续第三年通过安全理事会关于延长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任务期限的建议。摩洛哥利用我国作为小组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道主义事务部分主席的双重身份,在2019年人道主义事务部分高级别活动期间组织了首次建设和平委员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席会议。

最后,几十年来,摩洛哥也一直承诺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马拉喀什举行第二十二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以及在通过我国国家能源新战略后——该战略旨在实现用本土资源满足我国60%以上的能耗——这一承诺增加了十倍。摩洛哥王国现在被称为负责任环境管理的典范,也与非洲内外的若干伙伴分享在这一领域发展的专门知识。

其他几个因素对建设和平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联合国一体化”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国可以帮助其会员国确定必须优先考虑的主要挑战和领域。

最后,考虑到疫情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我谨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现在必须侧重于减轻其消极后果,后果的严重程度只有在未来几年才能确定。

我们必须确保这场危机不会进一步加剧冲突的根源, 并尽可能不危及来之不易的和平红利。

附件44

纳米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内维尔·格策的发言

我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11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主席组织今天这场非常切合时宜的公开辩论会，讨论冲突和不安全局势的当代驱动因素。我还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和其他通报人的精辟发言。

自联合国75年前创立以来，国际社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对冲突的共同驱动因素和根源有了更好、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经济衰退、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以及治理架构薄弱。随着世界不断扩大和进步，出现了新的冲突驱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健康危机和网络威胁。可能会出现更多新挑战。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很快就让世人认识到，全球健康危机会对我们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影响。在COVID-19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仅仅8个月后，这场大流行病就造成了全球金融和就业危机。它还扩大差距，加剧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冲突地带的居民变得更加脆弱。秘书长7月2日在安理会发言时警告，

“原已存在的不满和脆弱性变得更加突出和固化，不稳定和暴力的可能性有增无减”（见S/2020/663，附件1）。

因此，大流行病正在加剧各种已经众所周知的冲突和不稳定因素。

如我于9月份在安全理事会就环境退化对和平与安全的人道主义影响举行公开辩论会期间发言（S/2020/929，附件29）时指出的那样，武装冲突和暴力及其根源、层面和解决办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此外，气候变化有可能使各国多年来取得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逆转。因此，人们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威胁倍增，从而加剧原有的风险和挑战。萨赫勒和乍得湖盆地目前的局势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随着乍得湖的不断缩小，依赖它的社区必然会陷入困境。对日益减少的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人移居更大的城市。这种恶性循环加剧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该区域爆发冲突。气候变化还对包括我国这个美丽国度在内的沿海国家构成真正威胁，因为海平面上升危及生命和发展进度。

如今天公开辩论会的概念说明（S/2020/1064，附件）所强调的那样，在2011年2月11日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发表的主席声明中，安全理事会重申，

“为了支持一国可持续地摆脱冲突，需要采取全面统筹办法，纳入和加强政治、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活动之间的协调一致性，消除每一冲突的根源。”（S/PRST/2011/4，第3段）。

该声明还强调了安理会对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的支持，并指出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以做出的贡献。

安理会应更多地利用建和委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各自侧重的领域所能提供的专门知识和见解。此种协作只会使那些致力于促进和平与安全并确保执行《2030年发展议程》的人受益。随着世界变得日益相互关联，面临多方面相互依存的挑战，联合国系统也应采取统筹兼顾、协调一致的全系统办法。

COVID-19大流行和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只会加强这样一种想法，即安全理事会必须处理并解决冲突的多重根源。安理会还应增加对预防机制的投

入, 包括在设立、运行和监测预警系统方面的投入。我们作为会员国, 也必须更加努力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解决这些问题。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哈格·根哥布先生在今年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表预先录制的讲话时强调, 在面对COVID-19大流行及其严重影响之际, 我们应重申在一个受国际法约束的世界和一个任何人都不应感到被排除在外的多边体系中开展合作的集体承诺(见A/75/PV.6)。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尽管并不完美, 但却是加强治理以及保护我们在各自国家所服务的人民的公民自由和基本权利的重要工具。一个有效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是我们抵御战争、核扩散、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生存威胁的重要保障。因此, 我们必须继续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多边主义, 这一点至关重要。

附件45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约卡·勃兰特的发言

荷兰王国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11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此外，荷兰王国感谢主席就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问题召开今天适时而重要的会议，着重讨论冲突与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

我们知道，冲突与不安全有着诸多的驱动因素，而所有这些驱动因素都因冠状病毒的影响而加剧。除了导致生命的不幸丧失，这场大流行病还使一些本已动荡的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给某些社会的人权带来更大压力，加剧公众的不满情绪，并危及在建设和平领域取得的成果。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联合国。荷兰王国认为，有三个要点对今天的讨论至关重要：一是联合国改革；二是建设和平筹资；三是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

第一，关于联合国改革，显然需要加强跨支柱合作，包括围绕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之间的联系开展的合作，以实现可持续的建设和平目标。协调发展、安全与人权三领域的行动，齐头并进，对于实现可持续建设和平目标至关重要。本着这一思路，派驻实地的联合国行为体必须在驻地协调员的指导下开展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建设和平基金证明，各方相互协调行之有效，荷兰王国是该基金最大捐助方之一。

第二，关于建设和平筹资问题，荷兰王国认识到，对建设和平努力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幸的是，尽管需求继续增加，但对建设和平努力的供资仍然严重不足。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采取行动，确保建设和平领域的供资充足且可持续。

荷兰王国欢迎秘书长2020年关于建设和保持和平的报告(S/2020/773)中提出的建议，特别赞同一点，即应该建立各种筹资机制，以确保适时从维持和平向建设和平顺利过渡。年度认捐会议等新筹资举措以及关于筹资和良好建设和平捐助者风范的进一步的基于行动的讨论很有价值。还可以把如何具体贯彻落实秘书长所提建议的问题纳入这些讨论。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应强调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的因素。从这场大流行病的全球影响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人和社区承受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使保持社会凝聚力与和平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有条理地把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纳入建设和保持和平工作，对于缓解和避免冲突循环、打击解构行为和um提高建设和平努力的效力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把和平建立在破碎的精神和破碎的社区基础上。

我们期待继续与会员国、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各行为体、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伙伴合作，在这些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

附件46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萨姆森·埃泰格博耶的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阁下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团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还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非洲联盟发展署首席执行官易卜拉欣·马亚基先生、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希拉里·比克尔斯爵士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穆尼尔·阿克兰先生以及其他人士作了颇有见地的通报。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侧重于具有应对当今世界复杂冲突的战略框架的政治进程和政治解决。这种框架旨在消除联合国系统内部和会员国中间存在的各自为政现象。在几十年自上而下建设和平努力之后,政策行为体断定,确定保持和平途径的最佳办法是自下而上的办法,这种办法更具包容性,更能够消除引起冲突和源自战争的民怨。建设和平行为体需要设法通过消除冲突和不安全状况根源和动因的综合应对战略来满足相互竞争的需求。

然而,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驱动因素包括贫穷、不平等、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非正常移徙、族群间暴力、有组织犯罪、强行获取自然资源行为,最近还有新冠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以及气候变化构成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这些因素大大加剧持续和具有挑战性的安全局势,长年累月影响个人和社会。

在某些国家,不安全状况还越来越由旧冲突的复发而不是新冲突的出现驱动。这些旧冲突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以及国家能力薄弱和治理不善等因素,还有人口增长和快速城市化等各种人口因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会为暴力创造机会,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暴力持续不断,进一步改变全球安全架构。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称,经历暴力冲突的国家不可能在一代人时间里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无法实现。

COVID-19大流行对世界人口本身的生存构成具体即期威胁,这一威胁因世界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脆弱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变化、城市拥挤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所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挑战旨在缓解这场毁灭性大流行病的努力。

尼日利亚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经济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自然资源枯竭而言尤其如此,而自然资源枯竭会给环境造成长期影响。鉴于农业作为非洲许多民众主要生计来源所具有的重要性,这种气候问题经常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排斥,而这些排斥往往会加剧被边缘化社区内原有的紧张状况。这些事态发展可解释为什么冲突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

还应当知道,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民众已经遭受这场大流行病引发的多重风险,而缺乏市场准入以及供应链中断和流动限制导致市场关闭,则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有些地方,尤其是难民营中,保健和环卫设施不足,民众无法保持社交距离,这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安全风险情况,高感染率有可能易向附近社区蔓延。因此,COVID-19大流行暴露出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并影响到抵御和恢复的前景。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挺身而出,顺势而为,全面参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战略咨询能力和秘书长的建设和平基金。这将有助于弥补巨大治理差距,并开

展在尊重会员国当地习俗和价值观的情况下制定的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参与的项目和方案,以消除冲突根源。

国际和区域倡议在应对世界上的冲突和不安全状况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以及各国、区域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必须积极主动,首先防止冲突发生。而当冲突确实发生时,则必须动用所有机制,迅速加以应对和解决。为此,安理会应利用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制来处理、预防和应对冲突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

我国代表团认为,需要制定有效的长期战略,以便优先处理此类问题。这包括处理青年失业、妇女被边缘化、不平等、社会排斥等问题,尊重人权,创造有酬就业机会,建设一个基于法治、可持续增长和落实旨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社会。

我们同意,我们必须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包括生态系统的退化。必须把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和平努力,和平努力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和环境。这无疑需要采取全方位办法,齐心协力处理冲突和不安全问题。

最后,不可否认,消除当今世界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驱动因素是一项集体责任。整个联合国系统必须支持各国和区域努力应对不断导致会员国之间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威胁。

附件47

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我们欢迎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邀请我们思考当代导致新冲突出现或现有冲突加剧的因素。在目前脆弱情势下,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们谨感谢各位通报者作了清晰的介绍。

秘鲁在作为非常任成员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期间,曾有机会密切关注影响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不安全动因,并认识到迫切需要消除这些动因。我们同时指出,没有万能的办法,而是必须考虑到每种局势的具体情况、各国的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和所有进程的自愿性质。

显然,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全球挑战已扩展到国际安全领域。我们已经看到该疾病的影响:贫困和边缘化加剧,民众对于公共机构的信心削弱,选举进程的推迟导致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出现新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联合国推动的和平进程陷入停滞。

这些情况应促使我们加强对话、预防和调解行动以及国际合作。我们愿强调,《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和平解决工具对于维持和发展集体安全系统,从而防止和平遭受新威胁是有效的。

在此重要关头我们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就是,在抗击该疾病方面取得切实进展,同时申明多边主义是各国和其他有关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采取步调一致的支持行动,从而取得公平、平衡和包容性成果的最合适的工具。

近期,必须立即遵守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的全球停火,秘鲁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一停火。这是预防和减轻COVID-19的破坏性影响和加强外交行动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措施。

秘鲁还认为,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大,正在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和冲突,而这些危机和冲突因其范围之广,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加强与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与直接参与预防和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机构的协调,并使之系统化。

我们强调,这种协调应考虑到该系统各实体的能力和职权,同时增进有利的协同效应,以处理会员国面临的特殊需求以及风险、危机或冲突局势。我们认为,从安理会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要及时掌握信息,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对于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应当如此,对于需要采取必要预防行动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也应如此。

最后,我谨强调指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必须更多地处理这些问题。建设和平委员会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国际社会必须给予认可和支持。

附件48

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恩里克·马纳洛的发言

菲律宾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理会11月主席，并欢迎今天在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这一议程项目下就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举行公开辩论会。

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各国日益致力于遵守解决争端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国际准则，社会排斥和族裔对立等触发冲突的因素呈下降趋势，总体冲突水平一直在下降。

然而，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气候危机是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被认为是“逆向发展”，损害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果。这些所谓的驱动因素因地而异且具有多个层面，对和平与发展领域的各种重要成果产生了直接、间接和遗留的影响。

鉴于当前现实，菲律宾在今天的讨论中提出以下看法。

关于COVID-19，疫情引发了空前危机，暴露了社会的脆弱性，特别是威胁到战患地区在寻求公正持久和平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

罗德里戈·罗阿·杜特尔特总统认识到COVID-19大流行可能对实现和平的工作产生影响，在秘书长3月23日呼吁全球停火的几天前，就宣布从3月19日至4月15日与菲律宾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单方面停火。

秘书长赞赏这一举措，称“履行这些承诺对于有效应对COVID-19危机和疫后恢复至关重要”，同时鼓励“双方据此势头继续努力，使这些善意的表达变为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停火表明，菲律宾政府致力于向急需紧急医疗服务的民众迅速和不受阻碍地提供公共卫生援助，特别是确保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安全通行。

冲突局势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工人和移民工人，格外能够感受到COVID-19的影响。因此，负责在冲突局势之前、之中和之后保护妇女和女童人权以及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机构必须保持充分运作，确保继续采取注重性别平等、对文化和冲突具有敏感认识、促进和平的方针。

关于气候危机和粮食安全，联合国机构发布的《2017年和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年度报告显示，冲突和气候多变以及极端天气破坏了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努力。该报告显示，2019年经济放缓和下滑也削弱了这些努力。2020年，COVID-19大流行和东非史无前例的沙漠蝗灾爆发令人始料未及，也令经济前景趋于黯淡。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采取空前措施，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最近的许多粮食不安全状况可归因于冲突增多，气候造成的冲击又常常加剧了这些冲突。即使在某些和平局势下，经济放缓也造成粮食保障状况恶化，威胁到穷人吃饭问题。过去15年间，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发，环境状况发生变化以及由此造成虫害和疾病传播，这些都是导致贫困和饥饿恶性循环的因素，机构脆弱、冲突、暴力和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现象更是加剧了这种循环。

对此，菲律宾农业部采取了生存、重启和发展的做法，并大力突出提高粮食供应、缓解吃粮难和粮价高以及价格稳定和自给自足问题。该部提出了一项

重大倡议,即“人人有粮吃计划”,旨在确保粮食安全,提高我国农民和渔民的生产力,推动农业部门提高增长和收入。

我们要想弥补当今危机与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差距,就必须通过制定具有清晰政治目标、体现问责风气的稳妥战略,来消除COVID-19和气候危机等暴露出的脆弱因素。

这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2018年5月14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2018/10)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设计和部署应以政治解决为指导,因为政治解决是执行授权任务的基石,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始终至关重要。在该声明的第五段,安理会认识到

“在应对有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有必要权衡所有各种对策,并且应把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和着力建设和平工作作为处理冲突根源等因素的政治战略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办法。”

尽管这个概念整体得到支持,但是安理会成员在连贯执行时却举步维艰。鉴于COVID-19和气候危机的双重挑战,也许现在到了在行动上贯彻落实这个概念的时候了。

保持和平面临多层面的风险,为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球的领导与合作,以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重大考验。

附件49

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主席先生，鉴于这是在你领导下举行的首次正式会议，我们谨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担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主席，并祝贺你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们还赞扬主席国举行本次关于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的及时辩论会。

当今的冲突已变得更加复杂、持久以及多变，并且蔓延到边界之外，影响到更广泛的地区。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活动、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网络威胁、族裔间暴力、境内流离失所和难民流动、环境退化、气候变化以及粮食无保障只是我们每日所面临挑战的一些例子。我们不仅要处理所有这些挑战，而且还必须处理它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的互动。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对国家和国际上处理这些复杂风险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它还加深了受冲突影响国家和脆弱国家已有的脆弱性，并有可能逆转在发展和建设和平方面取得的成果。

因此，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采取一种统筹连贯的做法，推进保持和平议程。具有挑战性的是制订政策，不仅处理这场大流行病本身，而且处理与气候变化等其它区域或全球性危机的潜在冲撞。COVID-19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均有可能加剧人类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现有的冲突动因。

气候变化是另一个给民众的安全与生计带来巨大影响的全球性威胁，它既是不稳定的诱因，也是其催化剂。要全面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就必须顾及诸如水源压力和争夺自然资源等威胁。

波兰密切关注安全理事会有关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安全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感受到气候变化后果的将大多为那些治理薄弱和面临其它社会经济挑战的国家与地区。这就是为什么稳定局势和建设和平的工作必须对气候变化具有敏感意识，并且必须更多地强调预防议程。

风险评估和管理战略、分享知识与经验以及能力建设对于增强复原力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凭借有效的基于可靠的气候-安全风险数据的预警系统，我们可改进预测工作，从而更好地防止危机。因此，我们支持把处理该问题纳入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和维和行动的任务授权。

发展、健康、环境以及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联密不可分。因此，本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精神，我们的一揽子恢复经济方案应旨在重建得更美好、更绿色，并且把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以及包容性作为特别的侧重点。从这个角度出发，增强妇女权能和青年参与这两者举足轻重。

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第2310（2016）号、第2312（2016）号以及第2331（2016）号决议通过四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采取一种更加全面和跨支柱的做法来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以及建设和平方面已取得进展。和平与安全支柱已变得更加连贯，它为和平进程各阶段提供支持的能力有所提高。尽管如此，要在精神上和实践中奉行我们的预防性政策，仍有工作要做。

要有效减少威胁，就必须培养联合国各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以及联合国外地特派团内部的风险评估能力。减少冲突风险

需要具有复原力和接受问责的国家机构、善政、社会凝聚力以及立足于保护人权的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

最后，波兰赞扬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它把国际、国内以及地方一级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召集起来，审查和处理复杂的建设和平挑战，包括在大流行病爆发之后。我们大力支持建和委同包括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外地特派团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内的各种联合国机构密切协作。

我们还强调调解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需更加协调连贯地支持秘书长的调解倡议。早期和恰当的政治和外交接触能够而且应该防止或减少冲突。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要发挥关键作用。

附件50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科·杜阿尔特·洛佩斯的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举行本次及时的辩论会。

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所做的发言,并愿提出以下补充意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9条,安全理事会被授权“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我们面临的威胁不断变化和演变,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威胁的范畴也必须随之变化,以便它能够履行自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比如,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这些领域的交叉点应该成为我们集体行动的侧重点,因为各种威胁在此互动,变得更为严重。作为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一员,葡萄牙欣见安全理事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

最需要帮助的国家 and 处境脆弱的人群已经意识到如气候变化、水源稀缺、粮食无保障、生物多样性流失、大流行病、仇恨言论、假信息、恐怖主义以及有组织犯罪等新兴的复杂挑战对其安全的影响。当持续洪涝或者气候模式多变导致粮食无保障时,当欠发展阻碍防治大流行病的工作时,当海平面上升时,当民众的生计受到威胁时,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即使这些不是族群间暴力和冲突的直接原因,它们也肯定是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同样真实的是,已经处于冲突局势或脆弱环境中的国家无法独自妥善应对这些挑战。

对国际安全采取被动态度是不够的。根据秘书长的预防议程,气候安全机制等早期行动机制是良好做法,它们的工作应该为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所有相关联合国实体的工作提供信息。

至关重要的是,要对和平与安全采取综合办法,将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信息、分析和做法联系起来。《联合国宪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本组织建立在同等重要的三个相互依存的支柱之上——人权、和平与安全以及发展。因此,跨支柱方法确实是必要的。

让联合国一体行动,对于努力从当前大流行病的全球影响中恢复过来至关重要。重建得更好必须本着真正合作的精神动员整个国际社会,不搞各自为政或争夺地盘,也不重叠和浪费地重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明确勾画了前进道路。我们应确保这一进程具有包容性,特别是对妇女而言,并通过发展伙伴关系和为此目的调动资源,集体地努力充分执行这一进程。

对建设和平架构的持续审查也证实了对所进行的改革采取整体方法的重要性以及注重实施的必要性。

建设和平委员会通过其召集和咨询作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以确保我们的集体行动对这些当代挑战和整合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行动的必要性有敏感的认识。

我们有架构、计划和基础。我们有多边主义作为最可靠的粘合剂。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将我们的工作和资源集中在一起并采取行动。

附件51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的发言

[原件:阿拉伯文]

主席先生,我谨就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我们赞赏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和其他发言者所作的宝贵通报。

联合国赖以建立的三大支柱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和平、安全、发展和人权的需要。因此,和平是卡塔尔政策的基本支柱。作为在一个因危机和冲突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地区的国家,我们完全理解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作为对《联合国宪章》承诺的一部分,卡塔尔支持了和平解决争端,以此作为实现和平的手段。我国的努力为通过调解和平解决一些冲突做出了贡献。我国最近在多哈促成和主持了阿富汗谈判,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称赞。此外,卡塔尔对人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冲突地区提供教育,作为建设和平的重要工具。

鉴于青年在实现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卡塔尔将于2021年5月主办青年全面和平之路高级别全球会议,该会议旨在使青年人能够在冲突频发地区的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重建努力并维持冲突后和平。会议将与联合国、芬兰、哥伦比亚及卡塔尔教育高于一切基金会合作举行。

作为应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影响的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卡塔尔向近78个国家提供了890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1000万美元,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了2000万美元。卡塔尔还提供了5000万美元,支持应对冠状病毒危机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的影响和改善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的努力。

中东旷日持久的紧张局势和冲突是对和平的重大挑战。令人关切的是,该地区正处于破坏稳定的新危机之中,这些危机使可持续和平成为难以实现的前景。

对卡塔尔的不公正封锁现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这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卡塔尔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一向支持基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所有倡议,以解决海湾危机。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殿下呼吁在共同利益、睦邻关系、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认真和建设性的对话。他向科威特已故埃米尔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殿下转达了他对调解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友的努力的承诺。

最后,卡塔尔再次承诺继续努力建设可持续和平,支持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

附件52

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布尔汗·加福尔的发言

主席女士, 请允许我对你和贵国代表团就这一重要而及时的议题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表示赞赏。

今年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 我们面临的许多现代威胁是多方面和相互关联的。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 如环境挑战和大流行病, 对全人类构成生存威胁。这些挑战要求国际社会给予集体和持续的关注。但是, 建设可持续和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传统的安全问题。它要求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应对长期和较长远的挑战。

和平与安全与发展密不可分。在国家一级, 各国必须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和行动, 为全球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制定包容性的国家政策、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采取多利益攸关方办法以及注重解决我们社会中最弱势群体, 包括妇女和儿童的需求, 来侧重于减少贫穷和不平等。

除了各国可以通过国家政策和行动取得的成就之外, 越来越明显的是, 各国不能单独应对跨国挑战。许多国家继续与冲突和暴力作斗争,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当代威胁的出现加剧了这些国家面临的斗争。

在这一方面, 正如《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述, 区域组织是建设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行为体。加强区域框架以支持加强合作、经济一体化和预防冲突, 将加强国家努力、建设复原力以及使各国能够更好地应对共同挑战。例如, 在东南亚,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过去五十年里促进了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东盟和联合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威胁。上个月通过的《执行2021-2025年东盟和联合国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第二个行动计划》将进一步加强两个组织之间的积极伙伴关系。同样, 需要在全全球层面集体采取行动, 开展合作, 以应对日益复杂和相互交织的挑战。

维护一个普遍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不仅对于新加坡等小国的生存至关重要, 而且对于营造一个福泽所有国家的更加和平与稳定的全球环境也具有根本意义。国际法院等机构在协助建设和平和促进国际法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70多年来, 国际法院一直在推动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时, 理应思考我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如何能够加强本组织在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方面发挥的作用。在这方面, 我谨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与新西兰今年共同协调2020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应采取以行动为导向的前瞻性办法, 以确保子孙后代有一个和平与可持续的未来。新加坡仍然致力于联合国的未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价值观和理想。

附件53

斯洛伐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米哈尔·姆利纳日的发言

我感谢主席在这个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前所未有和充满挑战的时候，在“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这一议程项目下就当代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驱动因素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首席执行官易卜拉欣·马亚基先生、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希拉里·比克尔斯爵士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穆尼尔·阿克兰先生所作颇有见地的通报。

世界正在发生迅速的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当代冲突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旷日持久。约有20亿人，大概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这些冲突往往与全球挑战相关联，不再受国界限制。

我们正在目睹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直接后果和次生后果，因为这场大流行与原有的人道主义危机相互作用，给本已脆弱的局势增添另一层复杂性。最弱势群体缺乏获得基本服务和保健的机会，受到治理薄弱和卫生系统脆弱的影响格外严重，而这也给他们的生计和社会保护造成了影响。这场大流行病使转型中国和冲突后国家在保持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可能出现逆转。

查明和了解冲突对于确定什么地方可能需要我们进行干预并制定预防、管控和解决冲突的措施和政策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支持和平进程，预防冲突和解决危机，以期建设和保持和平。

我谨重申，斯洛伐克支持秘书长旨在使联合国和平行动成为促进当事国和平与安全并推进当事国政治进程的更有效工具的改革。我们高度赞扬秘书长在这一领域发挥的领导作用，包括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该倡议使会员国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斯洛伐克全力支持2020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这一审查为应对各种威胁对保持和平构成的紧迫挑战提供了及时的机会。它强调了加强与国际和国家卫生和金融机构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并重申了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在支持国际社会协调一致应对危机方面发挥的咨询、召集和搭桥作用。

在建和委2020-2021年任期内，斯洛伐克担任该委员会的成员，在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作为成员的优先事项可概括为三个“P”和三个“C”：“参与(participation)、伙伴关系(partnerships)和人民(people)”以及“一致性(coherence)、协调性(coordination)和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斯洛伐克随时准备促进与其他过渡进程的伙伴关系和协同作用。

我们需要加强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任务的相互联系，力求更有效地利用促进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工具，包括综合规划、实施和评估，以确保连贯性和一致性。COVID-19大流行，加上原有的驱动因素，使联合国开展有效、敏捷、有求必应的和平行动变得更有必要。

我们认识到确保顾及社会各阶层需求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应继续成为所有努力的核心所在。国际社会需要注重与国家和区域行为体合作，强化国家能力和机构。与民间社会，包括妇女和青年领导的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会有助于充分衡量在实地产生的影响。斯洛伐克大力支持妇

女平等充分参与所有旨在建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并呼吁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的所有相关决议。

斯洛伐克坚信,多边合作对于切实应对当代冲突的驱动因素至关重要。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在加强综合跨支柱办法以及汇集政治、安全和发展伙伴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审查现有任务授权时,必须考虑采取有助于为长期可持续和平奠定基础的撤离战略。会员国越来越把第2151(2014)号决议所体现的安全部门改革视为维和行动的重要优先事项,包括为了及时结束维和特派团。多年来,斯洛伐克一直认定安全部门改革是有效预防冲突和成功进行冲突后重建和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联合国许多和平特派团和行动的直接经验清楚地表明,国家主导和包容各方的安全部门改革对于建立不加歧视、代表民众和能够切实满足具体安全需求的安全部门机构至关重要。

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需要应对世界正在面临的新型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需要特别关注COVID-19大流行如何造成新问题并加剧社会经济鸿沟、性别不平等以及妇女和女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不安全增加等现有问题。

斯洛伐克大力支持秘书长呼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和实行全球停火,并支持秘书长呼吁通过下列三条行动路线对COVID-19大流行作出紧急和协调的反应:处理这一卫生紧急情况;注重消除这一危机的社会影响,包括作出经济反应;以及力求重建得更好。

附件54

斯洛文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尔加·巴夫达斯·库雷特的发言

斯洛文尼亚谨赞扬组织者及时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我非常高兴地提出斯洛文尼亚的意见。

当今冲突日益复杂、相互联系和旷日持久，这要求更好地了解冲突的驱动因素并作出适当的反应。尽管发出了全球停火呼吁，但冠状病毒病(COVID-19)作为人类今天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不仅威胁来之不易的发展和建设和平成果，而且还可能加剧冲突或引发新冲突。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和广泛。这些影响是促使风险倍增的因素。气候变化的影响，诸如迅速变化的天气模式、愈加频繁和严重的干旱、洪灾以及海平面升高，可导致人道主义灾难、冲突、粮食短缺、人口流动以及经济、社会和人口冲击。我们每天都在跨越人类的临界点。其后果是人的安全、发展、暴力冲突以及建设和平努力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增大。受武装冲突影响的社区和国家往往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日益面临各种风险和影响的叠加。

人道主义需求为历史之最。需求和可用资金之间的差距仍在逐年扩大；此外，COVID-19对发展中国家和遭受人道主义灾难影响的国家造成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注重预防和先期行动以及复原力建设，这可有助于在灾害发生时减少人道主义需求。

斯洛文尼亚承诺将我国长期人道主义供资的至少10%专门用于这些活动。我们每年都能顺利提供这种资金。此外，我们重新规划了所有双边发展援助项目组合，以确保今年的发展和人道主义项目至少有20%侧重于帮助伙伴国应对COVID-19大流行。重新规划的一个特别侧重点是援助弱势群体。

今后数年，气候变化将继续放大催生暴力、流离失所和不公现象的因素，风险更加多见，并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一个已知的事实是，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缺水。世界人口的40%已经受到缺水的影响，预计到2030年，水需求量将增加50%以上。在武装冲突中，水资源和设施日益遭到袭击，并被用作战争武器。这要求对供水、卫生、水管理和跨界合作综合施策。

不平等和排斥助长挫败感和边缘化。尊重各项人权——不仅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还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进行预防的一个不可或缺因素。人的安全必须成为早期行动和优先考虑最弱势群体的核心。我们还知道，性别平等与复原力密切相关，而妇女的参与对于在预防冲突、调解乃至保持和平等方面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在纪念第1325(2000)号决议二十周年之际，必须强调这一点。

联合国成立75周年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借以集体反思如何调整其实体的业务性质，以应对快速变化和日益复杂的世界，打除各自为政和推行更加全面的做法，并扩充实例资料库，将风险因素纳入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和维和行动。

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在新发局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充其成套工具，增加预警和预防资源，并采取更系统的做法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行动紧迫，需要立即做出反应。

附件55

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我们谨祝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团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 并举行本次高级别辩论会讨论冲突和不安全的驱动因素。

自赢得独立以来, 苏丹已多次发生内部争端和冲突。苏丹冲突错综复杂, 这是其多层面以及引发和激化这些冲突的历史和现代因素造成的结果。这些冲突在多个方面对总体人道主义和经济局势产生不利影响。

苏丹发生的事情是其它非洲国家遭受的种种冲突和内战的一个实例。这类冲突因种种原因而爆发。这些冲突大多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 而其它则是对小规模部落和族裔争端实施政治操纵, 以及在如何组织全国选举或是否接受选举结果方面发生争端的结果。有些冲突与争夺国家权力有关, 而另一些冲突则是由自然资源及其利益方面的争端所致。肆虐萨赫勒地区的荒漠化和干旱产生的影响导致争夺水和牧场的冲突。在一些局势, 如达尔富尔的局势中, 农民和牧民之间发生冲突。同样, 非洲一些地区仍在着力解决破坏民族凝聚力的身份认同冲突。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加剧了这些冲突的蔓延。因此, 消除冲突及其肇因带来的挑战的唯一途径是处理发展中国家武器和弹药的广泛扩散问题, 做法是采取以下三项行动, 即建立管理武器库存的良好制度、控制其流动和销毁过剩武器。

尽管面临这一黯淡形势, 但是前景看起来确实更加光明, 因为近几十年来, 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 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帮助下, 非洲在实现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了进展。因此, 结束非洲战争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非洲大陆制定了一项促进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明智计划。该计划的其它目标包括在善治、尊重人权和民众权利方面取得进展、承诺不破坏宪政安排、预警机制、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以及利用传统和民间机制解决争端, 借鉴这些机制给社会留下的重要和有效传统。这些努力因非洲国家解决冲突起因和根源的政治意愿得到加强; 政治意愿是该进程的基本先决条件。几周前, 苏丹得以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从而结束数十年的战争, 平息了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的枪炮声。

我要发表的最后一点看法是, 为评估不稳定和冲突的起因和肇因, 首先必须了解每一个案的性质、各种层面以及政治和文化背景。这一做法使得有可能制定一项全面和适当的战略, 其中纳入社区、国家和大陆各级的正式和非正式调解机制, 并以更有效的方式巩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的努力。

附件56

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帕斯卡尔·贝里斯维尔的发言

[原件: 法文]

瑞士谨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举行本次辩论会, 并感谢通报者通报情况。

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局势正受到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和气候变化等现有挑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安理会必须认识到这种关联, 并加大其介入力度, 从而采取一种全面的做法, 调动联合国的三大支柱, 以便能够解决冲突和不安全的根源。

以下三个行动领域要求安全理事会加大介入力度。

首先, 在民众中存在严重不公和弱势的各种情形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威胁到建设和平努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可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加剧不同族群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必须防止发生这些灾害和粮食无保障。这就是为什么瑞士正在帮助索马里的社区搭建一个预警系统。安全理事会的决策、特别是涉及和平特派团任务授权的决策必须依据对气候变化所致风险的系统性分析。为此, 我们呼吁安理会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内部现有的资源, 其中包括气候安全机制, 该机制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以及实地的各种架构结合在一起。瑞士赞扬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承诺, 也赞扬成立有关该问题的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专家组。

其次, 如安全理事会在第2532 (2020)号决议中所声明的那样, COVID-19大流行病有可能逆转转型期和冲突后国家在建设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大流行病之后重建得更好的工作必须用一种包容性的基于人权的做法作为指导。建设和平委员会处在理想的位置, 根据会员国确定的国家优先事项, 倡导联合国系统三大支柱与其主要机关连贯协调地应对。我们呼吁安理会充分考虑建设和平委员会对其工作的贡献。

第三, 当前危机带来共同挑战的同时, 也打开了机遇之门。瑞士发起的“蓝色和平倡议”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联合管理共享的水资源可减少紧张, 促进不同国家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稳定关系。多个具体项目已在中东、中亚以及西非得到实地落实。安全理事会通过联合国特别政治特派团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 支持预防外交, 依据了同样的做法, 拥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潜能。

和平、发展和人道主义行动之间的关联对于瑞士的外交政策、包括担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明年担任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以及如果当选担任2023年至2024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工作至关重要。

附件57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乌克兰高度赞赏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倡议举行本次重要的辩论会，并感谢所有通报人的通报。

处理当代风险因素及其对于已经因为未决问题而不堪重负的整体安全环境的影响这个想法值得支持。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清楚表明，新兴挑战如何可使我们努力处理长期威胁的工作更趋复杂。突发卫生事件、粮食无保障、环境退化、气候变化以及网络威胁只是这些有可能引发冲突的新挑战中的少数几个。

这些引发冲突的因素大多不分国界或者经济增长率，因而我们完全赞同在本次辩论概念说明（S/2020/1064，附件）中提出的假设，即：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绝不能孤立地处理。遗憾的是，国际上努力应对当代威胁与挑战工作的实际效果依然不足。

有一种解释是，在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应对过往的威胁—侵略主权国家、占领和企图吞并以及违反国际法等行为。

我们大家知道，冠状病毒给那些存在其它健康问题的民众带来的风险更高，预防和治疗要做到有效，还必须处理常常很复杂的并发症。这与全球正在发生的情况类似。国际秩序的免疫系统—即国际法—因为频繁的公然违法行而遭到削弱，而COVID-19恰在此时对其发起攻击。

因此，显然如果不妥善和充分地应对武装侵略、企图吞并以及被占领土军事化带来的各种安全威胁，有效治疗大流行病和处理气候变化等不安全的其它当代驱动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

鉴于以上威胁，国际不稳定问题的主要动因之一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断遭到侵蚀。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团结一致的努力。为此，处理该问题以防止某些国家利用这种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推行其侵略政策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乌克兰的情况尤其如此，我国受到俄罗斯的武装侵略，它对我国部分领土的非法占领已进入第7个年头。乌克兰面对的是一场国际性武装冲突，其发生是某个国家对过去的过时的地缘政治考虑和企望的结果，该国有意识地决定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侵略者准备好违反国际法以谋求政治、经济以及领土上的好处，这仍是冲突最危险、后果也最惨重的驱动因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的伤亡人数和人们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被占领土上被非法羁押和失踪，这些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完全赞同在本次辩论会概念说明中提到的对于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多达2.5亿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关切。在这方面，值得回顾的是，已有150万乌克兰公民因其居住的乌克兰领土被非法占领而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

由于顿巴斯的冲突完全是人为的，侵略者为挑起冲突和进一步煽风点火而极尽其能事。煽动仇恨和仇恨言论、包括散布虚假新闻和不实信息的破坏

性影响以及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做法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这些问题应进一步处理,直到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办法。

在被占领土上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之举还应被视为占领国破坏和平解决前景的蓄意所为。乌克兰临时被占领土上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局势因为对乌克兰公民、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持续采取镇压政策而进一步恶化。

在这方面,必须明确的是,侵犯人权、践踏国际法基本规范的一方不配作为可靠的伙伴,处理全球议程上包括大流行病和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紧迫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来保护国际法,所有成员作为负责任和可靠的推动者,捍卫基于规则和基于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只有强有力的机构、特别是强有力的安全理事会才能保障国际安全,处理冲突的当代驱动因素。

附件5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愿感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必须结合联合国的三个支柱，对冲突和不安全问题采取全面的做法。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和气候变化表明，各自为政在实地行不通，因为这两者影响会导致并放大冲突与暴力的条件，包括饥饿、基本服务中断、失业、争抢资源以及流离失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要素是预防以及为未来做准备。我们认为，不断地审时度势对于理解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至关重要。这些威胁使许多已经面临贫困、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顽固挑战的社区又增添了一层脆弱性。

在我们都为了更好地向前发展而做出政治努力、投入资源的同时，必须借此机会调整我们各机构的做法，使它们能够在一个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现象正在模糊国际体系不同部门之间界限的世界上切合所需。

我们要就安理会及其伙伴如何努力对和平与安全采取全面办法并为建立更公平、更有韧性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做出贡献提出四项建议。

第一，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加强协作，并鼓励不断增强协同作用。近年来，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安全理事会延长任务期限之前提供了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意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视情况参与审议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若干议题。这些关系应得到加强，我们期待2020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建议，特别是关于落实集体成果的建议。

第二，在总部层面进行协调至关重要，但实地层面的协调也不可或缺。我们要强调联合国“一体行动”以及激励协调和分享信息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实地。有可能取得进展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和平行动领导层之外的实地行为体的联系，特别是驻地协调员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代表。

第三，卫生危机与气候变化的影响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通常是可预测的。我们谨再次呼吁进一步发展联合国采取预见性行动的能力。提高对新出现威胁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调整任务和预算，以防止冲突及其驱动因素。我们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其他伙伴致力于建立模型，作出分析，以推动在已被可靠预测的灾害和压力出现之前提供资金。初步结果表明，采取预见性行动既能拯救生命，又能节约资金。

最后，除非各国能尽到一己之责，否则我们在此讨论的内容很少能产生具体成果。这个多边体系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其会员国，因为是它们带头制定各种政策和方案，帮助我们大家承担集体责任。为了说明这一点，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直在支持预防和应对COVID-19的工作，向118个国家提供了1500多公吨的医疗援助，其中许多是安理会议程上的国家，我们对此感到自豪。这场大流行病与气候变化一样突出表明，随着不安全驱动因素的日益增多，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我们期待着与会员国和联合国一起制定战略, 以便本机构的许多部门共同努力, 使和平与安全的价值最大化。
